

♣挥手作别 2010, 翘首迎接 2011, 《新视界》一路有你~

曹滢: 新视界, 新高度, 新感觉——2011, 再接再厉!

刘明: 2010 的喧嚣与躁动预示着海内外既有的结构与轨迹亟待改变, 变革, 自 2011 始...

阮艳婷: 看着新视界走过的每一步, 有种看着自己孩子蹒跚学步的感动——成长, 是我们一起的经历。

李文婷:

推盞停箸弃残羹, 调笑小子意不平。
宴已尽欢何兴叹? 且歌且啸且徐行。
不过又逢春歇事, 投石便闻碎玉声。
明朝放荡腰间酒, 人生何处不清明!

张奕:

作为南开国关人, 2010 年我见证了系刊创刊, 同时又有感于自己有幸可以和系刊一起成长。2011, 无论身在何方, 永远都会心系系刊, 因为她是南开国关人心里永不熄灭的一盏明灯。

新视界

NEW VISION

年终特辑 · 2010 国际时事年终盘点 P01

学术讲堂 · 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 P42

海外国关人 · 多伦多漫笔 P65

论文工作坊 · 国际关系——多元的视角与方法 P70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办

愿同学们把这份
对国际的热情保持
下去。
张青化
09年10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办

2010年12月 第4期

(双月刊)



*****About us*****

主编：陈冲

副主编：李金潼 徐芳宇 龚秀娟 李文婷

编辑部成员：

袁婷 陈永 张奕 狄英娜 阮艳婷

刘明 吕海 曹滢 张晓康 董柞壮

任娟 权贤美 姜忆楠 潘丽丽

封面设计：徐芳宇

*****Contact us*****

E-mail: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Website: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编的话

即将逝去的 2010 年，留给了我们太多难忘的记忆：世博会、亚运会的精彩纷呈、盛大辉煌，玉树、舟曲抗震救灾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东海、南海波涛里笃定自信；气候谈判上持重负责，半岛危机中奔走呼号……这让我们自然地把“中国”与“给力”联系在了一起。可是，中国“给力”的事儿又何止这些呢？

我们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勾心斗角”中，看到了中国的积极合作和突出贡献，听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声音；我们在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上看到了中国的穿梭身影，感受到了一个崛起大国的分量；我们在他人的冷嘲热讽中看到了中国的从容自若，重获了一个新兴大国的应得尊重。在本期《新视界》中，我们将带您一同来盘点 2010 年中国的“给力”印象，一起聆听中国的声音；中国人民大学的康晓博士在气候变化的“绝对”和“相对”收益框架下，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让中国迈向更加负责任大国的康庄大道；外交学院的林民旺老师在考察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声誉获得历程之后，针对中国国家声誉和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处方”；左超同学同样以中国崛起为背景，指出我们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的新背景下，要谨慎应对国际制度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制衡，警惕盲目乐观背后隐藏的“悲催”。

不过，“悲催”也好，“给力”也罢，不论居于庙堂之危高，还是处于象牙塔之幽深，2010 年我们一直携手走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关心着崛起的中国；我们一直未敢忘“国关人”使命——“常怀天下之心，常抒报国壮志”。是年夏天，我们创办了国关人切磋砥砺、一抒己怀的《新视界》——我们自己的“心灵家园”。无论是在“论文工作坊”中的激烈争论，还是在“学术讲堂”中的思想交锋，都挥洒了我们对国关的激情，对家国的热爱。有国关人说国关犹如天文，有简约而幽深之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也有国关人负笈海外，宵衣旰食自不待言，回望故国，却唏嘘感怀。

即将走过的一年，除了这些“给力”的印记外，也让我们对 2011 有更多期望：期望我们《新视界》越办越好，期望我们的南开越来越年轻，期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伟大。

2011，又将是“给力”的一年！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目录

主编的话.....	(I)
年终特辑	
2010年国际时事年终盘点.....	(1)
学术论文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兼论中国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可能贡献.....	康晓 (17)
书山有路	
制度现实主义与制度制衡 ——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崛起》.....	左超 (32)
国关人物	
约翰·米尔斯海默	(39)
学术讲堂	
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	林民旺 (42)
他山之石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 (二)	陈冲 刘丰 (55)
欲把国关比天文——我心目中的国际关系学	杨原 (64)
海外国关人	
多伦多漫笔	段沁 (65)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目 录

新书架（四）	（67）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第一期：国际关系——多元的视角与方法	（70）
院系活动	
学术交流	（73）
师生活动	（75）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80）
征稿启事	（85）

2010 国际时事年终盘点

【编者按】敲下“年终盘点”四个字，始终是惶然：挑了又挑的选项，或许终究无法涵盖又一年东西南北的风云变幻；简而又简的表述，也许也无以贯穿 365 个日日夜夜的偶然或必然。2010 年的世界年历，如果是你，会在哪个时刻借炽烈的红标注激情、惊叹或愤怒，会在哪个瞬间用深深浅浅的湛蓝圈点和平、发展或和谐，又会在哪个时点以灰暗的调子寄托沉默、叹息与反思？幸而对于世界的关注，对于未来的希冀，一如既往：且行且惜行将远离的 2010，欣然、淡然、坦然，迎向 2011 的第一缕曙光……

年关将至，本刊编辑部有感于一年来国际舞台上的云谲波诡，特置“年终盘点”栏目，回顾 2010 年的国际风云变幻。编辑部在全校范围内通过网络开展了“2010 年我最关注的 8 件国际时事”评选活动，经过为期三天的网上投票，最终评选出了 2010 年 8 件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大事。随后，本刊编辑部特别采访了我校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相关领域的老师，邀请他们对这些时事点评盘点。国际关系系各年级同学也踊跃参加，通过本刊搭建的平台与老师展开对话交流。

1. 中日钓鱼岛冲突——关注度 96.4%

9 月 7 日上午，钓鱼岛海域一艘载有约 15 名船员的中国渔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而后又与追踪的另两艘日本巡逻船中的一艘发生碰撞。随后日方登船检查。巡逻船部分受损，没有人员伤亡。中国籍渔船和日本巡逻船均未沉没。9 月 25 日，被日方非法抓扣的中国船长詹其雄乘中国政府包机安全返抵福州。

➤ 专家看法

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由来已久，从我接触的日方的资料和新闻报道，我觉得双方在处理这一次冲突的过程中，对对方的外交政策还是存在很多误解和误判的成分。比如日方曾一度抓住胡书记在外国使节会议上提出的“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将它作为中方外交政策转型的信号而大做文章，这体现出了中日关系的敏感性。

日方在此次事件中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有借由此次事件在国际上制造“钓鱼岛本是日本领土”的舆论，这在我们看来是对于中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的倒退，或许这也是中方此次“态度强硬”的原因。

而此次事件也反映出我们在处理类似紧急突发事件方面的不足。例如日方在事件后期曾屡次提出赔偿要求，这在我们看来是无理和荒谬的，但却并没有作相应的有力回击；这需要



运用到一系列更为周详、细致的危机治理的理论、方案、措施，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思考与研究。

——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贾义猛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频繁挑战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海权意识逐渐觉醒和中国海上力量的日益强大。日本希望在中国海军羽翼丰满之前，联合美国的力量将中国未来可能主导东亚海域的前景扼杀在摇篮里面。

日本对中国尤其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已经认识到了海洋权利的重要性。中国实施的海洋战略与日本的海洋立国战略相冲突。因此，在中国实施这种战略的前期就“出手”扼杀，尤其是与美国一道行动，日本的胜算较大。

另外，日本如今从中国获取资源和原材料的能力已经被大大限制，中国近来禁止对日稀土出口即为一例。早点发动对华的战略攻势，有利于摆脱中国的这种限制力，以继续获取中国的资源。

如今就海军力量而言，中国目前与日本尚存差距。但随着中国航母和其它先进战舰的大量服役，中日之间的海上力量对比将发生逆转。如果早点对中国动手，日本可以避免未来向中国俯首称臣的不利局面。

——国际关系系讲师 阎梁

钓鱼岛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反应出了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动对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立场、政策上的影响和作用；而更深层次上则应看到，中日之间无论是“政冷经热”，还是近几年这种时而蜜月时而陷入冰点的不稳定态，都与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紧密相关。



——国际关系系讲师 霍特

➤ 学生看法

邓子立：钓鱼岛撞船事件对日本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在中国，民族主义诉求依然强烈，官方表态依然毫不含糊，然而应对方式更为迅速、灵活、多样；在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外交经验欠缺，民众普遍对国防外交感到耻辱和不满，日本转向把中国当做战略对手，更加依赖美国在军事上制衡中国的威胁。撞船事件对日本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

兰村：钓鱼岛一直在中日两国的民间闹得沸沸扬扬，对于此类“离了”领土争端的问题，我认为不应该参考的是历史上归谁所有，而应当是实际受谁控制。因此，中国想要恢复对其的主权不应该仅仅强调历史因素，而应当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黎银霞：日本方面，借机显示对中国钓鱼岛占领并行驶主权，企图让中国接受这个事实。

鸠山政府下台的原因与去美国化有关，菅直人政府必定会吸取教训，向美国示好，而对中国的强硬，正是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

崔莹：中日钓鱼岛问题中，我个人认为我国的态度不够强硬，就像朝鲜此次一样，应该拿出手段让对方看看，言论没有威慑力，以前的各种言

论可能已经使他们麻木了，所以才会一次次的挑衅。

朱晓燕：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不宜退让。而这件事也是中日博弈的一环、政治游戏的一种，最终结果如何，就看两国政府的决策了。

李瑞、王晓迪：只有毗邻，才会有争端，如果在中日之间树起一道屏障，那么中日就不会变成邻居，也同样不会有钓鱼岛问题。当前，钓鱼岛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且受美国保护。而中国国家军力尚不成熟，远洋维权的行动还受限制，收复钓鱼岛变得遥遥无期。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无动于衷。个人认为，我们要树立这个屏障，讲日本阻绝在东海，使其无法近身。而这个屏障的最佳选择，就是琉球。

美国人在亚洲的战略构想是亚洲人打亚洲人，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从深层次上说，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不亚于我们，这从入常问题上美国对日本投反对票看得出来。美日之间有历史宿怨，又有现实利害。按照刘亚洲的观点，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核心是中美联手，所以他要牢牢的掌握日本。

看清了美国的利益需求，对于我们解决琉球及钓鱼岛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通过琉球事件，帮助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让东亚局势三足鼎立，同时争取日本，对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良性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不能拘泥于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而应当从中跳出来，作出全新的思考和把握，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2. 朝韩半岛态势紧张

（炮击事件——关注度 81.8%；
朝韩：“天安舰”事件——关注度 80%；
韩美联合军演——关注度 69.1%）

11月23日下午，朝韩两国在边界处互相炮击，造成十数人死伤，数十栋建筑起火，令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韩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



声称，韩国西部延坪岛海域当天遭受来自朝鲜方面的炮击，韩国军队进行了回击。朝鲜方面则称，是韩国首先向朝鲜领海进行炮击，朝鲜军队才进行回击的。

3月26日晚，“天安”号警戒舰在西部海域值勤时因发生爆炸而沉没，舰上104名官兵中仅有58人生还。韩国打捞人员于4月15日和24日先后将“天安”号舰尾和舰首打捞出水，并在舰内发现40具船员遗体。韩国于5月20日正式发表有关事件原因的调查结论显示，综合各种证据来看，“天安”号是受到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的。

7月底，韩美两国在日本海进行的“不屈的意志”军演；9月27日，两国在黄海(韩称西海)进行为期5天的第2次联合军演，目的是“增强反潜战斗能力和加强韩美战斗合作能力”；炮击事件过后，驻韩美军司令部24日表示韩美预定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黄海上进行联合军演；据悉，美国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也将参与演习。

➤ 专家看法

美韩军演、韩朝炮击等都是相关联的，在我看来朝鲜半岛问题也可以说是今年的热点问题，这从你们的投票结果也可以反映。

这一问题向来牵系着韩、朝、中、日、俄等多方，而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背景因素即是美国在东亚势力的存在。可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是有其一贯的政策主张与安排的：一方面，通过向其盟友提供军事、安全支持等手段，它力图维持该地区的稳定；而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上考虑，这最终与它维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维护它在地区和世界的霸权体系的目标紧密相关，因而一旦有国家想要挑衅滋事，美国定会采取必要手段遏制和威慑。美国在今年一系列事件中的反应，应该说很能反映出它一贯过度依赖武力维持霸权的倾向和美国外交战略、政策的惯性。



朝鲜半岛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地缘政治因素，历来是许多大国利益的焦点和博弈的集中体现；而也应当看到中国在解决这一地区争端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我想也是大洋彼端的美国所乐于看到的。

——国际关系系讲师 黄海涛

很多人认为美国参与军演和在炮击事件中的反应等等，在处理朝韩问题外还有针对中国的因素在，我想就这点简单谈一下。

应当看到，美国之所以参与军演，有作为其盟国的韩国邀请的因素，因而不能断然说是美国是“意指中国”。但从天安舰事件到炮击事件，微小事件改变地区形势和国际格局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警醒和思考的。在我看来，美国在处理这些事件中展现出了加强在该地区的控制的倾向，这使我们所面临的周边环境 and 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和严峻；中国应该认识到，经济上的恩惠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要以积极主动应对的心态，在战略上认清形势，继续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军事、海防上的充实提高，更沉着应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

新挑战。

——国际关系系讲师 刘丰

这次军演是韩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尽管朝韩两国的关系一直都是处于一种“非和平状态”，但是现在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也是十分罕见的。现在的局面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是一个挑战。以前六方会谈虽然会有挫折但仍能持续，但是现在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日本，对六方会谈的拒绝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个事件对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挑战应该说是最大的。中国该如何斡旋？该如何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这对中国的外交智慧都是一大考验。比较看来，钓鱼岛问题对中国来说还不及韩美军演紧迫——钓鱼岛问题与南海问题相似，是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长期问题，它没有紧迫到直接挑战中国当下的外交战略。

——国际关系系讲师 刘兴华

眼下朝鲜半岛冲突不断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却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即使冷战结束后也是基本如此，即形成了中、俄、朝国家集团与美、日、韩国家集团的战略对峙。因此，朝鲜半岛冲突的阵前是朝、韩角力，背后是中国、俄罗斯与美国、日本在撑腰。

朝鲜半岛不会因为此次“炮击事件”（以及其他形式的小规模冲突）而走向战争。朝鲜在此次事件发生后也保持了沉默。

可以推测，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德森与金正日的会谈可能取得了积极成果。据 CNN 最新报道，美朝会谈后，朝鲜已经同意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在美国、朝鲜和韩国之间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及单独开通与韩国的军事热线电话等建议。如果这些报道属实，那将是近年来朝鲜对美国作出的最大让步。这再次证明，美国的决策及其行动，对于渴望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签订和平协议的朝鲜来说，是其决策的主要依据。

《华尔街日报》12月18日报道，“华盛顿支持韩国的演习，这实际上是逼平壤亮出底牌，因为朝鲜经常扬言要发动全面战争但最终都没付诸行动。奥巴马政府的官员说过，他们想打破几十年来朝鲜挑衅—会谈—会谈破裂—再挑衅这一循环。此次美国坚定地支持韩国军演，并且有意在演习现场布置美国军人和外国记者充当“人肉盾牌”，其实就是要看看朝鲜到底有什么牌可打？朝鲜多年来反复祭出的“全面战争”与“核战争”的“狼来了”的把戏，可能演不了多久了。

朝鲜在半岛制造局部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策略而非军事策略。全面战争可能会动摇朝鲜的政治基础，而且也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从韩国方面看，炮击朝鲜只不过是配合美国向朝鲜施压，韩国也不敢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做出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是，韩国首都首尔的全部人口实际已经沦为朝鲜的“人质”。首尔聚集了韩国 1/4 的

人口和 1/2 的经济活动，但始终处于朝鲜数千门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内。只要朝鲜在可能的武装冲突中吃了亏，朝鲜就可以用廉价的炮火把首尔炸平。美韩虽有隐形战机、巡航导弹和航



空母舰，都不如这火炮群的效费比高。因此，朝、韩真正准备开战的前兆就是首尔出现大规模的居民撤离和转移非不动产等现象，否则双方小规模冲突都是配合幕后大国博弈的逢场作戏。

——国际关系系讲师 阎梁

你们所选取的事件中，我非常关注朝韩问题。朝韩问题出现以来的16年，可以说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个人感觉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受挫的。

——国际关系系讲师 霍特

➤ 学生看法

赵楠：朝鲜半岛局势危在旦夕，世界目光再一次聚焦于此。朝鲜正处于政权更替的关键时期，使得原本处于黑幕之下的国家行为越发显得危险；韩国也紧追不放，联合军演还不够显示其气势更想要实弹军演。局势之危险可见一斑！

李同学：朝韩炮击使半岛紧张局势恶化，是否会引发战争争议不断。但个人认为，朝韩双方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朝鲜借此获得国际关注并为政权交替打基础，韩国以此进一步巩固美韩关系彰显其在东北亚的重要作用。

孙同学：韩美联合军演本是寻常事。韩美每年都要举行军演，且数目繁多，可是之前咱们都没有太过在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今年格外重视了韩美之间的军演。总结：世上本没有什么事，如果对其重视了，就成了大事。

杨同学：美韩联合军演以威慑朝鲜为目的，但其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多的是做给中国看，显示美国威风灭中国势头！

茅军芳：彼此都知道战争的伤害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就算背后有美国等实力型依靠，身为战争的双方也一定会把握分寸，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相信战争是没那么容易爆发的。毕竟这个舞台不只有他们两个演员。

刘小宁：军演标榜加强美韩之间的合作，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军演的黄海海域是中国伤痕未愈的地方，它承载着中国近代的屈辱。美韩联合军演企图一箭双雕：既想威慑朝鲜，又借机耍给中国看。我们要做的，不是竭力呐喊，也不是听之任之，而应是理性的思考。



孟丹：朝一定通过炮击产生相互的威胁与震慑才满意吗？这样有助于他们解决问题吗？就算是要追求利益，这样能达到目标吗？

王芳琳：朝韩事件是即将上任的朝鲜新一代领导人金正恩让韩美了解自己想法的一次前

奏，结论是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影响真的很大，特别是对外政策。

李磊：对于美韩联合军演，我想说，军演有一箭三雕之意，既是对朝鲜“嚣张气焰”的打压，也是对东亚的一个威慑，同时也向外界表明美韩的同盟关系很稳固。我想中俄会精神紧绷，面对这样频繁的军演，我想西太平洋一定不会安稳了。

刘加菲：韩美联合军演：这是对和平的挑衅，是美国挑拨朝韩兄弟的手段，朝韩两国人民以及整个东亚人民都需要提高警惕，战争对整个亚洲没有好处。

吕海：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是冷战留给现在的地雷，而现在韩朝半岛的炮击事件就像踩到地雷边缘的脚，再往前迈一步地雷就得爆炸了。紧接着的韩美联合军演、中韩渔船相撞，让朝鲜半岛阴云密布，大战似乎一触即发。面对危机，几个大国的表现各不相同。羸弱的中国重提六方会谈的老调，干嚎各方保持克制，遭人冷落；美国先与韩国大搞军演，姿态强硬，然后又撇开中国，单独与朝鲜谈问题，今日美国州长结束访问朝鲜，称对访问结果满意，似乎颇有成效；俄罗斯则强调通过政治外交手段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似乎不是特别关心，没有了冷战时期的热切关注；日本则态度强硬，借机扩充实力，日前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日本防卫省新《防卫计划大纲》，让东亚局势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应有的魄力，不能一味的强调和平解决和克制，“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强硬时就强硬，发挥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应有的魄力。同时中国不应只从朝鲜方面下手，与韩国、日本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联系，相互通气，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做好自己一直想充当的“和谐老人”的角色。

3. “维基解密”网站泄密事件——关注度 78.2%

2010年，维基解密网站先后将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保存的逾47.7万份秘密文件公之于众，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今年11月，“维基解密”又将超过20万份美国外交加密文件对外公布，震惊了各国信息和安全技术专家。

➤ 专家看法

从同学们根据网上投票结果确定的今年热点问题的排序来看，维基解密事件位居第三，仅次于中日在钓鱼岛冲突及朝韩冲突之下，它的影响也被称为是一场“战争”，一场网络战争。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一事件都很有意思。作为一件大宗的美国信息情报泄密事件，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洞察美国政府外交活动的机会，官方外交的神秘、庄严在此荡然无存，难怪有人说这是外交的“9·11”事件。美国外交以及美国的国家形象再次受到冲击。维基泄密也将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监管问题再一次置于全球关注的中心位置。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是全球化的实质性内容。作为最便捷的交往渠道，



互联网可以共享信息，也可以制造危机，维基解密也为我们认识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提供了又一个案例。

——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王翠文

维基解密事件从短期来看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甚至由此联系到 70 年代的水门事件；但它的冲击力和带来的深远影响，还需留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国际关系系讲师 霍特

➤ 学生看法

刘雯：“维基解密”事件的发生勾起各方对“秘密外交”的怀念，外交到底应该透明化还是秘密化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如何处理这种“表里不一”的言行，如果没有那么多“秘密”，又何担心被“解密”呢？

王芳琳：维基解密一方面看出西方舆论的自由，另一方面看出西方国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张同学：“维基解密”影响力何在？其解密材料真实性有待质疑，其内容也并未涉及外交核心，而且对美国的冲击也只不过是轻微碰撞，也许更多的只是炒作的影晌吧。



李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凤凰网上一边倒的支持且认为阿桑奇是英雄，并且大约百分之八十九的受访民众十分认同《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公开维基解密内容的做法，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认为维基解密损害了国家利益。

针对这种现象，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受访者大多是中国民众，在“损害国家利益”这项内容上肯定不如美国政府或人民理解得深刻，因此出现这种状况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些内容并非是什么国家核心机密，有很多都是美国外交人员对他国领导人的一些主观的评价，这些更像是一种随意地“调侃”，很难说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这可能也是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原因之一。

但是关于阿桑奇极高的支持率和支持公开解密内容的呼声，则表明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莫过于：大众由于知情权和话语权的丧失（或称为部分丧失）而产生的焦虑感、受挫感和无力感。维基解密实质上是“两代传媒分工合作、报网结合威力骤增”的结果，它让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所谓的“国家机密”和大众行使民主自由权利之间的矛盾。因而，维基解密所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一种“困惑”。

4.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关注度 61.8%

自 2010 年初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危机持续了半年有余，至今年 7 月形势暂缓。

➤ 学生看法

黄同学：希腊、爱尔兰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是考验欧盟危机管理能力的关键时刻，也关系到欧元区的未来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一体化一直以来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柱，如今如何处理欧元区危机越显重要。



5. 2010 上海世博会——关注度 52.7%

第 41 届世界博览会于 2010 年 5 月 1 日-10 月 31 日在中国上海市举行。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总投资达 450 亿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记录。

➤ 专家看法

世博会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确实有很大的提升。

——国际关系系讲师 霍特

➤ 学生看法

贾方方：上海世博会成功闭幕，一方面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欣欣向上、朝气蓬勃的发展形势，另一方面在与世界各国比较之中，也凸显中国科新能力的不足。尽管世博会已经结束，

技创

但在“后世博时代”创新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

李晓锋：“世博”不仅要让中国人看世界，也要让世界看中国。看的不仅是中国的总投资达 450 亿元，看的不仅是世博的人山人海。世博更应该吸引的是国外的目光，而不是自娱自乐。

陈名明：上海世博会刷新了世博会历史上的诸多纪录：参展方最多——246 个，园区面积最大——5.28 平方公里，参观人数最多——7308.44 万。还有一项也许更有玩味：总投入 286 亿（另有说总投入超 4000 亿）也是历史之最。而希望工程实施 20 年来，已募集资金 53 亿元，援建了 15000 多所希望小学，资助了 330 多万名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为现中国自豪的青年都是好孩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子。

孙熙隆：庚寅三月，仲春之初，淞沪之地万邦来朝，览天朝盛世之景者何，乃我天朝上国展泱泱国风，为世博之会也。天下士莫不欣欣然焉，以为必大利于我，经贸立国之言益甚矣。余以为所谓世博会者，耗资数十亿，惟博万国一笑尔。昔晋平之施惠，楚灵之细腰，嬴秦之阿房，靖康之艮岳，逮与此同。此即言者所谓经济立国者乎！

冯岱言：谁说穷人不能潇洒，中国办世博会就很潇洒！

温照：中国有举办世博这种国际性盛事的能力，但是中国人还缺乏参与这些大型活动的素质。

6. 中国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劫持事件——关注度 45.5%

8月23日，乘坐21名中国香港游客的观光客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遭劫持。菲警方实施解救行动，击毙劫持歹徒。这次事件导致香港旅游团中8人死亡、两人重伤、5人轻伤。

➤ 学生看法

郭迁迁：从此次菲律宾对劫持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公共应急能力。作为一个国家，在对待有巨大影响的危机事务中居然造成众多人员伤亡令人惊讶。两国在关于此事的沟通交流中仍缺乏有效地机制，外交上仍不成熟。



陈凯：秋去冬往，这件事或许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回头想想，菲律宾特警在人质解救过程中漏洞百出的表现是偶然还是必然？

枪与火的闪动，生与死的瞬间，几条鲜活生命溘然长逝。中国是强大了，但是中国人的生命却依旧渺小卑微，一切真的发人深省。

♣ 特别关注 ♣

坎昆气候变化大会西方国家态度探究和中国应对

坎昆当地时间12月11日凌晨3点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在通过了《公约》和《议定书》两个工作组分别递交的决议后，终于落下帷幕。

按照最终决议，发达国家将按照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减排量减排，但是对此没有强制要求；发达国家设立一个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就如《英国金融报》所言，此次坎昆大会依旧还是以美国为首的“伞

形国家”、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旗手欧盟三国之量。

♣日本：

坎昆气候变化会议最大的搅局者不是直到最后还投反对票的玻利维亚，而是会议第一天就抛出“不会在任何情况或任何形势下就议定书设定减排目标”的日本。最早提出“环境外交”这一概念，并通过亲手起草《京都议定书》获得较好国际声誉的日本，此次在废除议定书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1. 您认为日本公然在气候问题上表现出倒退姿态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日本是一个环境立国的国家，它的环境外交在它的总体外交里面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从当年日本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签字上可以看出。但是，环境外交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些年来，日本发现，他们推动的《京都议定书》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气候行动的基础，但对本国来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为了积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日本在国内强制性的减排政策一直遭到以电力、水泥等大企业代表的反对。随着日本经济危机的加重，今年6月新上任的首相菅直人尚缺乏政治基础，不得受制于大企业的利益诉求。所以，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干脆放弃了过去要为世界做贡献的理念，把国家经济利益考虑放在首位。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其实此次坎昆会议中，日本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日本一上来就声明，必须废除《京都议定书》，为什么？这是要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户拉进减排的队伍，而且日本还要做出排放的数据指标规定。而中国呢？一上来就坚定宣称，绝对不会同意日本的主张，一切都要以《京都议定书》为准，坚持双轨制路线。说白了，中国仍然希望像哥本哈根会议一样，坚持有差别的义务。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京都议定书》今后肯定会终结，而减排的指标将有新的规定。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 陈功

♣ 欧盟：

坎昆会议上，欧盟承诺到2020年时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如果其他发达国家也作出相应努力，主要发展中国家能承担足够责任，欧盟愿意把减排目标提高到30%。而在此前，众多评论认为，欧盟在此次会议中积极起到主导作用，挽回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失利。





1. 您认为欧盟在气候问题上表现出的无力、不积极缘由何在?

欧盟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者,积极致力于促进全球性的气候保护行动和制度构建。这与气候变化首先威胁欧洲和欧盟已掌握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有关。但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欧盟元气大伤,欧盟各国纷纷将政策重点转向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大大降低。其次,欧盟成员规模的扩大,内部经济实力和文化的差异,使欧盟内部在重大气候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难以整合。此外,欧盟政权的更迭,由绿党转向偏右翼的政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推动意愿大大减低。所以,在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但其领导地位在短期内不会逆转。只是欧盟的立场不够坚定,没有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满意的方案,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持,所以在坎昆会议上表现无力。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 美国:

美国在坎昆会议上表现低调。除了表明“美国会履行‘到2020年温室气体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承诺,但前提是获得国会批准”的态度,再无其他表态。同时,11月2日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败。充斥着“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美国共和党重新夺回众议院,并大大削弱了民主党在参议院的控制权。

1. 您对美国政治制度中,国会与总统关系对其在气候问题上表现的积极、消极

影响如何看待?

美国的谈判代表们一直寻求一份强有力的气候协议,他们希望这份协议能要求所有国家共同行动,减少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为脆弱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采取适应措施。同时美国代表们也重视京都议定书,虽然他们此前签署了但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达成的任何协议,必须是能够让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最终对美国生效的,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任务。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 费文莉

美国中期大选结束不久,那些新的参议员、众议员2011年1月才上任,所以新届国会要影响到2010年11月份的坎昆会议,是来不及的,这是第一。第二,实际上一个协议里面的内容,在美国是总统和行政部门要落实的。要是有一个新的协议,那个肯定需要国会的批准。谈判一个新的协议,需要国会的同意以及总统愿意支持,但是要是能在一个协议里面讨论内容,那是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责。坎昆的会议讨论属于前次气候大会已经固定了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已经既定了的,总统只确定具体内容。如果他要推翻框架,则需要国会同意。所以大选,即便是总统有更替也不会影响到美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总体框架。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能源及气候项目首席顾问 沈岱波

在气候问题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力推《能源清洁法案》。但在 2009 年美国气候立法的唯一成果只是《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微弱多数在众议院被通过。另外，美国参议院的气候立法进展非常不顺，减排目标和措施屡次修改也得不到足够数量的参议员的支持。即使在奥巴马上台时，民主党的形式一片大好，不仅赢得了总统宝座，而且在参议院占据了 60% 的绝对多数；这种政治格局下的气候法案在参议院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这就说明，



与其说是总统和国会的关系决定了气候变化问题的走向，不如说是两者关系的恶化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失败局面得到了巩固。其实是因为气候立法还遭到非常多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总统需要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才可能在国会中推动气候议案进程。但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势必会掣肘奥巴马的内政外交，所以在坎昆会议上，美国既不能让步太多又不能太强硬，固然表现低调。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坎昆大会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次选举结果的不利在于美国的众议院被共和党控制了。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外交决策里，国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九十年代在谈判《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克林顿政府在京都签字了，但是他回到国内，美国参议院就说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很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他们也没有承诺量化减排的这些指标，科学上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以这三个理由就阻止美国政府条约递交到美国的国会。所以后面克林顿政府根本就没有把那个提交，后面小布什干脆就退出了，就不提这事了。

本来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关键词是变革，但是两年之后，现在众议院给了共和党。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民主党、相对奥巴马来讲比较保守，所以在通过相关的法案，就是我们说的总量控制贸易与交易的法案可能很难通过了。现在如果国内不授权，美国政府它不可能在谈判当中作出一个具体的承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这个谈判领域的影响力是其他国家不能替代的，所以美国现在如果不能做积极的承诺，世界更多的国家将采取观望的态度。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商务部贸易与环境专家组成员 张海滨

美国国内气候变化的议题陷入了政治化的陷阱，近年来全无进展。在美国两党对抗的大环境下，凡是民主党支持的政策，共和党一定会反对。而支持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在 11 月份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在未来数年中，美国国内气候变化立法希望渺茫。奥巴马

政府所承诺的 2020 年前减排 17% 的目标也成了空中楼阁。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难以有所作为，更不可能起到领导作用。

——美国执业律师、耶鲁大学法学博士 郑叶青

2. 您认为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倒退态度对全球气候合作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影响有多大？

可以说，美国的态度对最近十年气候变化会谈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起起伏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 2001 年退出《京都议定书》，给这个全球气候协议以重大打击；美国在 07 年巴厘岛会议的最后关头表现出应有的领导力，促使了“巴厘路线图”的出台。由此可见，美国的态度是全球气候能否达成合作和协议的最主要力量。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时，美国具有国际号召力，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形成了以美国为首，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消耗大国的伞型集团。美国的消极态度让原本积极推动的国家失去动力，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日本的倒退、欧盟的无力，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能推动谈判进程的“胜负手”是美国。京都议定书欲进还退的命运显然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哥本哈根协议谈判美国主导的影子挥之不去。难以寄希望于仅凭欧盟一方的努力就能达成各方期望的国际协议。事实上，任何缺少美国积极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都难言成功。然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要使美国国会通过并提出让各方都满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目标困难重重。因此，现行气候制度下的谈判僵局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潘家华

3. 您认为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作为对其霸权合法性影响如何？



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现会影响其霸权地位的合法性，因为它没有很好的主动实施所谓的“自我战略约束”。但气候变化问题关乎国家主权和全球治理，特别是大国对新的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制定权。所以，美国仍然积极争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比如，美国退出《议定书》后，仍继续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并试图在“体制外”寻求新的解

决途径。美国现任政府内外政策的重心向低碳和气候变化倾斜，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低碳来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通过强调新技术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 综合视角：

2009年10月进行的皮尤调查发现，57%的美国人感到有证据表明地球在变暖（这低于2008年4月的71%），但只有36%的人认为是人类活动所致——低于去年的47%。而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全球变暖的质疑论在欧美开始蔓延，《国民评论》、《华尔街日报》、《科学美国人》、《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均刊登怀疑派观点。从环境角度看，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削弱了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的政治意愿。

1. 您是否认同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阻碍全球气候合作的看法？如果有，那

么这种作用体现在多大程度上？

其实国际气候合作的背后，必然有其相应的背景，也就是所涉及的驱动和约束因子。比如《京都议定书》的签订，看似一个环境协定，但却远远超出了环境的范畴。当初美国总统布什明确指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是：1）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未参与承诺；2）其履行的经济代价太高；3）科学上尚有不确定性。显然，国际合作的驱动和约束因子，主要涉及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在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怀疑论者越来越多，特别是主流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支持怀疑论的观点，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不确定性”这个用词似乎有些“不确定”了，可能这个词的含义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利益上严重分化，谈判中获胜集合（win-set）重合较少，主要发达国家对气候领域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消极态度，气候领域搭便车行为的盛行等等，都影响着合作的进展。

——国际关系系讲师 刘兴华

2. 目前一些西方专家、媒体表达了对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商业化的担忧，

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政治化使谈判的阵营组合和立场分野更加复杂；商业化使对气候问题的态度从“罗马俱乐部”式的道德关怀和人类使命转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碳排放市场使一些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势也把气候问题在国家和全球议事日程中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加上媒体的宣传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气候问题的关注。

——国际关系系讲师 刘兴华

3. 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必然会涉及到各国的经济利益，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

危机对发达国家拒绝在环境问题上做出承诺造成了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回顾近几年的气候谈判进程也可看出，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下子就转移了发达国家的注意力。无论是原本积极推进气候进程的欧盟，还是一直阻碍进程的美国，都无暇顾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是专注于本国经济。至今，日本仍处于经济低迷的状态，在环境承诺上表现出倒退，转而以国家利益为主了。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 中国应对：

“十二五规划”当中重点提及了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问题，新阶段中国建设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1. 您对中国参与气候公约与中国自身发展转型的关系如何看待？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也看得出来，在中国落实减排目标也不容易，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中国愿意面临这样一个挑战是很好的事情，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单位能耗下降一个节约钱；再者用的能源少了，污染物排放会变少，单位成本会降低，并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所以有很多方面的好处。此外，我们也看到，中国落实减排政策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但 2010 年中国省市的工作还是很积极的。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能源及气候项目首席顾问 沈岱波

从总体上看，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参与其中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也有可能使中国的发展受到约束，不利于小康社会的实现。所以，中国要利用好这把双刃剑，在推动国际公约进程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争取发展空间。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中国经济本身就要调整，这个调整和我们现在说的保护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是高度一致的，我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是高举保护气候变化的大旗。过去我们都说欧盟是很环保的，我认为中国要做的比欧盟还要环保。这件事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在这里面，中国要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这个国际合作中来。这个时候就说到未来，我有信心，我认为世界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比如像这种新兴经济体，他们真正在高速发

展，他们已经意识到，要走一个新型的发展道路，这种新型的发展道路是可以创造商机的，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会牵引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开创新的市场。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邹骥

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由发达国家提供减排资金与技术的要求，发达国家也横生枝节，提出附加条件，将其与受援国减排进程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问题挂钩，甚至以此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压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超出其义务的减排责任。

2. 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更多的公共国际事务上，中国如何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

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可以作出三种类型的承诺。第一，自愿承诺，通过一种自愿努力来避免国际社会施加刚性约束；第二，从坚持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以区分奢侈排放和保障基本生存排放为立脚点，维护我国的发展权；第三，条件承诺，在一些没有新的资金和技术注入就无法实现减排的项目中，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都是这类减排项目能否开展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谈判中具有一定主动性和进取性，又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硬性约束，有利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朱旭峰

中国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参与方，需要“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应对各种可能的谈判进程和结果。继续坚持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巴厘路线图”双轨谈判机制，联合发展中国家，态度鲜明，坚决反对并轨。继续巩固南方阵营，利用“基础四国”的核心作用，适当扩大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代表覆盖面，积极推动资金等议题，促使快速资金启动问题尽快落实。明确启动南南合作，积极协助和争取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权益，在南方阵营内让利，通过南南合作获利。敦促发达国家尽快确定合理

的中期减排目标并付诸实际行动，在必要时，可以在一些关键议题，如 MRV 等问题上做出有底线的让步以示好，展现中国公开、透明、可靠以及极富成效的减排行动。此外国内的减排行动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张力，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宣传中国的减排绩效。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潘家华

(责任编辑：徐芳宇 阮艳婷 李文婷 曹滢)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兼论中国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可能贡献

康晓*

内容摘要： 由于民族国家政府依然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角色，因此大国政治成为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决定因素，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博弈也贯穿始终。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转型期高度重叠，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矛盾更加凸显。但因为其对立统一性，这一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其推动力量正是全球治理中的大国政治作用。由于大国实力和观念的不断增长与形成，中国必将在调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矛盾中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 绝对收益 相对收益 气候变化 全球治理 中国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进行解决。但自从《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定约束性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开始，气候变化就不再是一个环境问题，甚至不是普通政治问题，而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战略问题。由于近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同时伴随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正值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变化最为深刻的时期，其战略含义也大为增强。归根到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纷争与合作还是源于全球治理本身包含的大国政治因素，因此无法避免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矛盾。国际社会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带来了国际气候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但相对收益的分歧又使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举步维艰。由于和国际格局转型期重叠，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相对收益集中表现在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设定约束性中期减排指标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两大问题上。其中低碳经济使气候与能源问题紧密相连，事关未来国际竞争和国际格局基本走向，因此成为决定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成败的核心要素。但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本身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其矛盾的缓解还赖以大国政治作用的发挥，包括大国的国家实力及其政治意愿。正因为如此，国力日渐腾升并愿意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中国极有可能为困境中的国际气候机制建设做出关键贡献。为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国际格局转型背景下，大国政治博弈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因素究竟如何影响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反之大国政治又能否推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发展。^① 本文首先将以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论述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对立统一性，然后以此为框架具体分析国际格局转型背景下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最后将探讨中国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可能贡献。

* 作者简介：康晓，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2008 级博士研究生。

① 关于大国政治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关系的近期文献主要包括：Loren Cass, *The Failures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Climate Policy: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Politics, and Unachievable Commitmen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Anthony Giddens,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Chapter 9, Matthew Paterson, "Post-Hegemonic Climate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1, No.1, February 2009, pp.140-158. 蔡林海：《低碳经济大格局：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潘家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绿叶》2008 年第 4 期，第 77-82 页；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2 期，第 44-50 页；于宏源、汤伟：《美国环境外交：发展、动因、手段研究》，《教学与研究》2009 年第 9 期，第 62-69 页；刘东国：《日欧美新能源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0 期，第 33-39 页；刘晨阳：《日本气候外交战略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0 期，第 40-55 页。



一、全球治理中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

冷战后全球性问题扩散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但其更深远含义体现在对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塑造上。在詹姆斯·罗森瑙（James N. Rosenau）看来，“治理就是秩序加意愿。全球秩序就是由世界政治不同时期的各种常规协议构成”，^①因此秩序可以基于民族国家政府权威的下降和非国家行为体地位的上升。但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非国家行为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其实包括三种基本关系模式，即讨价还价、相互竞争和超越，其性质“取决于对政治经济、安全和认同的相对重要性的价值判断”。^②实际上，当涉及核心国家利益时，非国家行为体往往是国家政府实现利益的工具。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治理能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大多也只是发出倡议和执行政策而已。一个典型例证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主要是因为各大国中央政府能迅速向市场注入上十万亿美元流动性，这是任何一个国际组织、NGO甚至地方政府都不具备的能力。所以，后冷战时代的所谓全球秩序本质上还是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说的国际秩序，而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力量之一必然是大国政治，包括处理好大国间关系和运用超群实力左右国际事务两条途径。^③正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极富历史哲学智慧的论断所言，“无论人类用星空还是卫星定位，或是用烟雾还是飞船通信，都无法改变战略的永恒本质。”^④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治理，但无法改变国际政治的大国竞争本质，大国政治依然是全球治理乃至秩序塑造的决定因素。当面临国际格局转型的关键时刻，大国竞争与合作的这种决定作用更加明显，这决定了虽然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共赢，手段是合作，但仍无法摆脱大国政治博弈中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矛盾的困扰，这一矛盾也成为理解全球治理的重要视角。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无政府状态能否实现国际合作。绝对收益的理论假设是，由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可以使各国收益比不合作更多，即带来绝对收益的增长，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合作。尽管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囚徒困境”，但重复博弈的互惠战略可以减少信息不确定性促进合作。^⑤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由于国际制度的功能性作用，^⑥互惠战略不仅能够产生丰厚报偿，而且可以有助于整个共同体惩罚不合作行为者促进合作。^⑦肯尼斯·奥耶（Kenneth A. Oye）则进一步指出，合作中的报偿结构、未来时间的长度以及参与合作国家的数量是决定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⑧

①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B2 2R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

②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208.

③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④ Colin Gray, "Clausewitz Rules, OK? The Future Is the past: With GP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1, December 1999, p.182.

⑤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⑦ Robert Axelrod, Robert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44.

⑧ Kenneth A. Oye,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is and Strategies," in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p.4-22.



相对收益的理论假设则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不同理解。约瑟夫·格理科 (Joseph M. Grieco) 认为,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就是“世界政治缺少一个共同政府”, 因此“欺骗也就成了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推动合作就是建立国际制度减少欺骗行为。但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的更深含义是“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阻止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毁灭或者奴役其他国家”, 所以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生存, 这使他们对任何侵蚀自己维持生存的相对能力的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目标是阻止他国获得比自己更强的相对能力, 即相对收益, 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能力将来会转变成对自己生存的威胁。^①

在此基础上, 格理科提出了相对收益的国家效用公式: $U = V - k(W - V)$ ($k > 0$), 其中 U 为国家效用, V 为绝对收益, W 代表合作者的收益, k 代表本国对不同合作报偿的敏感系数。由于 k 永远大于 0, 所以当合作者收益一定时, k 值越大, 本国的收益越小, 因此 k 值对于合作成功与否起到关键作用。格理科认为当出现合作者从长期看会变成对手、合作的议题是安全而不是经济、本国的实力处于下降期、合作中的收益能较容易地被合作者转换成相对能力, 或者这种能力能较容易地被合作者从一项议题转移到另一项议题中等情况时 k 值会增大, 合作也更困难。^②

对此, 新自由主义者的普遍回应是相对收益虽然重要, 但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如邓肯·斯奈德 (Duncan Snida) 认为, 如果参与合作的国家达到三个或者更多时, 相对收益就难以阻碍合作实现。^③ 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 也指出, 国家只有将相对收益转化成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时才会变得重要, 如果国家没有这种转化的机会, 那么合作将变得可能。^④ 基欧汉进一步认为, 格理科国家效用函数中的敏感系数 k 不一定只能为正, 实际也可以是零或者负数, 比如当联盟面对共同威胁时, 联盟霸主会增强盟友实力以共同应对。^⑤ 对此, 格理科坚持认为, 在国际关系中即使一国相信伙伴国在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利用获益差距反对自己, 但仍会担心这种差距在他不能确定的更远的将来, 当伙伴国出现新领导人或制度时, 是否会被用来反对自己。^⑥ 而针对早年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经济合作比安全合作更容易实现的观点,^⑦ 格理科通过研究 WTO 框架内的欧美合作后指出, 欧洲国家在技术壁垒和反补贴协议上与美国冲突的根源实际是担心自己的内部制度无法使其在这两个领域获得与美国同样的收益, 从而影响其作为独立实体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⑧

总结双方争论, 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涉及合作中总体收益的增长, 后者涉及收益增长后的分配。没有总收益的增长就无法分配, 没有分配的激励总收益也无法增长,

①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Fall 1988, pp.497-498.

② Ibid, p.501.另外, 格理科在另一篇文章中将这些因素具体概括成六个方面, 参看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alysis with an Amended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0, No.3, August 1988, pp.610-612.

③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3, Sep. 1991, p.722.

④ Robert Powell, "The Problem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4, Dec. 1991, pp.1316-1317.

⑤ [美]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79-280 页。

⑥ [美]约瑟夫·格理科:《理解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限度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未来》, 同上书, 第 312 页。

⑦ 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World Politics*, Vol.37, No.1, Jan.1984, pp.14-16.

⑧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0.



所以二者都是国际合作中的必然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其重要性决定于主观认知，^①即特定国家的政策选择，而这又取决于相应的合作议题和国家的总体战略。因此，对国际合作的分析不应只停留在体系层面，而应深入考察它与特定国家尤其是大国总体战略的互动。格理科对欧美关于WTO协议争端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二者的总体战略框架和内部制度特点，而迈克尔·马斯坦丹诺（Michael Mastanduno）对美日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领域的合作研究更为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分析提供了典范，在他看来，“国际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变化对美国政策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完全；一些国际体系中的变化在决策结果中消失了。为了解释这种变化，必须从国际层次的分析转向国内层次。”^②

可见，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概念的确有助于研究者更好理解国际合作中的规律性因素，但也只有与特定国家的能力与意愿结合起来才具有实质意义。所以，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应既包括对其中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具体分析，因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毕竟是收益计算和规范承诺的结合”，^③同时也应包括大国政治的作用，即权力和意愿的结合，由此才能深入理解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合作与纷争的根本原因及其解决途径。

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绝对收益

全球治理的首要特点是治理对象具有全球范围影响力，这决定了全球治理比传统治理方式更容易提供丰厚的绝对收益。气候变化不同于普通环境问题，其影响覆盖整个地球表面，因此只能通过全球治理方式解决，而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机制则是其制度保障。具体来看，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提供的绝对收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国际合作减少气候变化本身给世界各国和地区造成的危害。

全球气候变化是指由于地球表面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增加导致的大气温度上升。这里涉及两个核心问题：首先，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导致了气候变化；其次，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环境改变又给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因此治理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改变人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仍存争议，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经过长期独立研究得出的结论已基本被国际社会接受为“权威表述”，^④即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而“所有大陆和大部分海洋的观测证据表明，许多自然系统正在受到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温度升高的影响”，^⑤其具体表现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尽管IPCC评估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的危害具有国别和地区差异，但其危害范围总体上是全球性的，所有大洲都无法避免，这也使气候变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问题。由于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应对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以减缓（mitigation）、

① 关于认知因素在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中作用的研究可参见 David L. Rousseau, "Motivations for Choice: The Salience of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6, No.3, June 2002, pp.394-426.

② Michael Mastanduno,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6, No.1, Summer 1991, p.109.

③ Helmut Breitmeier, Oran R. Young, and Michael Zurn,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 From Case Study to Databas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6, p.234.

④ John Houghton, *Global Warming: The Complete Brief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9., 转引自薄燕：《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国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实例》，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5页。

⑤ 《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中文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出版2008年版，第2页。



表-1 全球气候变化对部分区域影响预估实例

非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到 2020 年, 预估有 7500 万到 2.5 亿人口会由于气候变化而面临加剧的缺水压力; • 到 2020 年, 在某些国家, 雨养农业会减产高达 50%; • 接近 21 世纪末, 预估的海平面上升将影响人口众多的海岸带低洼地区; • 预估到 2080 年非洲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土地会增加 5%-8%。
亚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预估到 21 世纪 50 年代, 在中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可用淡水会减少; • 在海岸带地区, 特别是在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人口众多的大三角洲地区将会面临更大的洪水风险; • 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因洪涝和干旱导致的腹泻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会上升。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预估到 2020 年, 在某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地点, 会发生生物多样性的显著损失; • 预估到 2030 年, 在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地区、新西兰北部地区和某些东部地区, 水安全问题会加剧; • 预估到 2030 年, 由于干旱和火灾增多, 在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以及新西兰东部部分地区, 农业和林业产量会下降;
欧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内陆山洪的风险增大, 更加频繁的海岸带洪水和海水侵蚀加重 (由于风暴和海平面上升); • 山区将面临冰川退缩、积雪和冬季旅游减少、大范围物种丧失; • 预估在欧洲南部, 可用水量减少、水力发电潜力降低、夏季旅游减少以及农作物生产力普遍下降; • 预估由于热浪以及野火的发生频率增加, 气候变化也会加大健康方面的风险。
拉丁美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许多热带拉丁美洲地区, 由于物种灭绝而面临生物多样性损失显著的风险; • 预估某些重要农作物生产力会下降, 畜牧业生产力降低, 对粮食安全带来不利的后果; • 预估降水型态的变化和冰川的消融会显著影响供人类消费、农业和能源生产的可用水量。
北美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预估西部山区变暖会造成积雪减少, 冬季洪水增加以及夏季径流减少, 加剧过度分配的水资源竞争; • 预计当今遭受热浪的城市在本世纪期间会受到更多、更强、更长时间热浪的袭击, 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 海岸带社区和居住环境将日益受到与发展 and 污染相互作用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压力。
极地地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预估在极地地区, 主要生物物理影响为冰川和冰盖及海冰厚度和面积的减少, 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许多生物产生有害的影响; • 预估对于北极的人类社区的各种影响会交织在一起; • 包括对基础设施和传统的本土生活方式的不利影响; • 预估在两极地区, 由于气候对物种入侵的屏障降低, 特殊的栖息地会更加脆弱。
小岛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预计海平面上升会加剧洪水、风暴潮、侵蚀以及其它海岸带灾害, 进而危及那些支撑小岛屿社区生计的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设施; • 预计海岸带环境退会影响当地的资源; • 到本世纪中叶, 预计气候变化会减少许多小岛屿的水资源; • 预计在较高温度条件下会增加非本地物种入侵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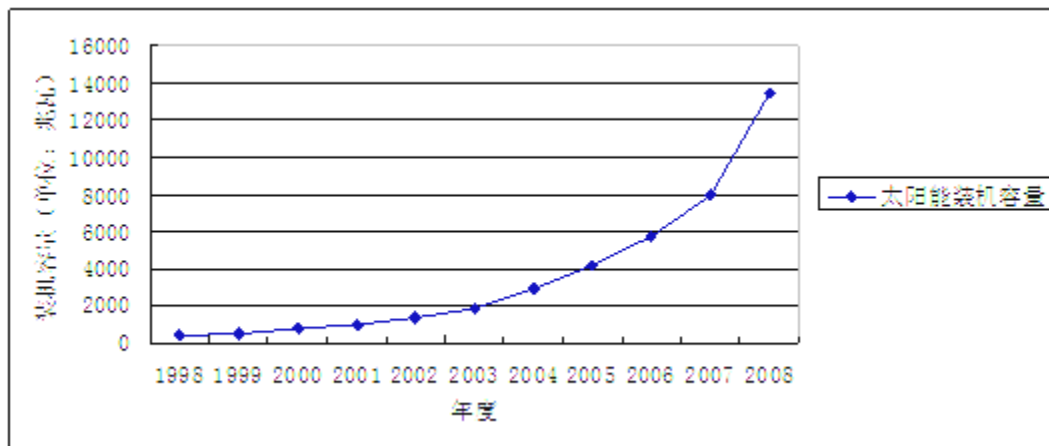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根据《气候变化 2007 综合报告》(中文版),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出版, 2008 年版, 第 10~11 页主要内容节选。

适应(adaptation)、资金和技术为内容的全球治理,目的就是改变人类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①。研究表明,“通过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从而降低气候变化的速率和幅度,人类社会能够应对气候变化”,^②因此可以认为气候变化治理的积极成果将使所有国家和地区受到气候变化危害的程度减小,这正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带来的首要绝对收益。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低碳经济发展将为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市场效益。

首先,气候变化治理带来了新能源产能的迅速扩张。以新能源中较具代表性的太阳能和风能为例,自1998年至2008年间,二者世界范围内装机容量分别由395.6兆瓦和10153兆瓦增加到了13444.9兆瓦和122158兆瓦,2008年更是比2007年分别增长了69%和53.8%,其趋势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世界太阳能装机容量增长趋势:1998—2008



资料来源: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数据整理,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8/STAGING/local_assets/2009_downloads/renewables_section_2009.pdf (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12月16日)。

其次,产能增长必然以投资增长为基础。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2006年的《国际能源展望》预测,如果能够在2050年将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带回到2005年水平,则到2050年全球有关低碳技术的累计投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占到此时全球发电量的60%。按照此情景预测,在2050年之前世界低碳市场的规模将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这将创造2500万个与低碳部门有关的就业。^③另据美国绿色能源调查公司Clean Edge 2008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的规模在今后10年将扩大10倍,由2007年的77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545亿美元。^④而

① 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目标”: http://unfccc.int/essential_background/convention/background/items/1349.php (2009年12月16日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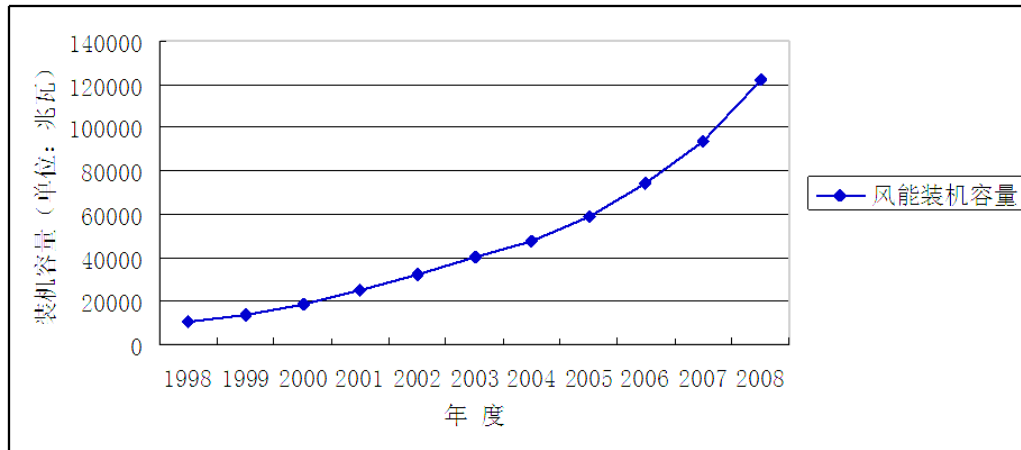
② 《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中文版),第56页。

③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70.

④ 蔡林海:《低碳经济大格局: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据更乐观的估计,由碳减排产生的全球市场规模在 2020 年将达到 8000 亿美元,2050 年将达到 49000 亿美元,^①而由此带来的就业增长将更加可观。

图-2 世界风能装机容量增长趋势: 1998—2008



资料来源: 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报告》数据整理,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8/STAGING/local_assets/2009_downloads/renewables_section_2009.pdf (最后访日日期: 2009 年 12 月 16 日)。

第三, 低碳经济发展还将为金融部门带来重要机遇。

一方面, 应对全球变暖的低碳技术成本较高, 因此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服务就成为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而由于全球低碳市场的巨大规模, 金融部门无疑也将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清洁能源技术的风险投资就由 2002 年的 164 个项目约 9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08 年的 567 个项目 84 亿美元, 其中在 2006 年时成为美国第三大风险投资行业, 从投资市场边缘迈向主流。尽管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 年该行业的风险投资下降到 557 个项目 56 亿美元, 但在风险投资总体下滑的背景下其降幅是所有行业中最小的。^②另一方面, 碳交易市场也将为金融机构开拓业务提供重要机遇。据《斯特恩报告》测算, 如果所有发达国家将碳交易市场覆盖到所有化石能源部门, 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增长 2 倍, 若碳交易市场建立在温室气体排放世界前 20 位的国家之间, 则其规模将增长 4 倍。^③此外, 对气候变化威胁的缓解与适应还将扩大保险业市场。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分析, 2003 年由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超过 400 亿美元, 预计这一数字在 2010 年将达到 1500 亿美元。^④

由此可见,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确实蕴含着巨大绝对收益, 这既包括治理气候变化本身带

^① Shell Springboard,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SMEs in tackling the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report by Vivid Economics for Shell Springboard, 2006, p. 20.

^② CleanTech Group, *Clean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Totaled \$5.6 Billion in 2009 Despite Non-binding Climate Change Accord in Copenhagen, Finds The Cleantech Group and Deloitte*, Press Release, <http://cleantech.com/about/pressreleases/20090106.cfm>, 2010-01-26.

^③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71.

^④ Steven Cohen,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Chi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16.



来的生态收益，也包括因治理而促进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收益。其中，由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跨越国界，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可能从治理气候变化的生态收益中获益。而由于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收益受制于市场机制，因此并非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但同样由于市场机制的扩散效应，可以保证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只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当中就至少可以拥有获得这些经济收益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份重要协议的签署以及国际气候机制的建立与发展，192个国家与相关组织的谈判代表和119个国家与相关组织的首脑才会于2009年12月齐聚丹麦哥本哈根，共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全球气候协议，这充分证明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所提供的绝对收益对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

但是，哥本哈根大会毕竟只以“注意”（note）形式留下了一纸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说明相较于政治和军事等传统议题而言，相对收益依然存在作为低层政治的全球性问题治理中，并且对合作的成功与否发挥着决定作用。因此，弄清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相对收益，并探寻推动它与绝对收益达成平衡的可能因素才是解决目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困境的途径。

三、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相对收益

根据相对收益理论，国际合作中相对收益作用增大的条件之一是合作双方相对实力正在发生变化，此时实力下降的一方会更看重实力上升一方是否获得比自己更多的收益，从而阻碍合作达成。由于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由‘泛欧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国际体系转型由此提上日程。”^① 这使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恰逢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变动最为深刻的时期，因此相对收益作用大为增强，具体表现为约束性减排指标和技术转让问题成为制约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两大核心障碍。

表-2 2004—203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单位：亿吨）

国家/地区	2004年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美国	59.23	65.89	69.44	79.50
欧盟15国	43.81	45.58	45.79	46.84
日本	12.62	12.90	12.94	13.06
中国	47.07	76.07	87.95	112.39
印度	11.11	15.07	17.20	21.56
俄罗斯	16.85	19.08	20.18	21.85
巴西	3.34	4.54	5.00	5.97
世界	269.22	338.89	368.54	428.80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EA），转引自庄贵阳、朱仙丽、赵行姝：《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数据整理。

① 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6页。



第一，约束性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可以大幅减缓一国发展速度，影响国际格局转型的时间。

温室气体主要产生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因此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在技术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因为压缩化石能源使用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以经济高度发达但能源结构高度依赖煤炭和石油的美国为例，如果完成《京都议定书》为其设定的约束性减排指标，即在 2008 至 2012 年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1990 年的水平减少 7%，则其国内生产总值会损失 0.2~2 个百分点，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将不堪重负。^① 与之相比，发展中大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但能源结构又大多依赖煤炭和石油，如印度 2007 年能源消费中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分别占到 51% 和 22%，^② 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就一直处于约 70% 的水平。另一方面，发展中大国在中期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比如按低经济增长情景预测，中国在 2010 年、2020 年和 2030 年的 GDP 增速将分别是 7.6%、6.7% 和 5.4%，按高经济增长预测则分别是 9.6%、8.1% 和 6.9%。^③ 这意味着中国在 2030 年之前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也必将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期（见表-2）。因此，发达国家坚持中国应在 2020 年设定排放峰值的要求就是要约束其经济发展速度，延缓国际格局转型的时间，维护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正如最近一份针对全美国 1743 位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所显示，其中 43% 的人认为中国是当前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则排在最不愿被看到超过美国的国家前三位。同时，又有 37% 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目前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际问题，46% 的人则认为它将是未来 10 年美国外交的最大挑战。^④ 对此，发展中大国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强调发达国家应首先履行减排责任的同时拒绝为自己设立任何约束性减排指标，目的就是要在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防止在发达国家鼓吹全球治理带来全球绝对收益的观念下丧失自己的核心相对收益。可见，国际格局转型与气候变化治理的高度重叠已使设定约束性中期减排指标成为达成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具有法律效力全球气候协议的首要障碍。

第二，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使一国获得未来国际竞争的科技制高点，掌握竞争主动权。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由英国政府于 2003 年 2 月发布的《我们未来的能源——缔造低碳经济》白皮书^⑤提出，“是在高人文发展水平前提下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 shared vision）”，其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⑥。但发端于 2008 年 9 月^⑦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全球金融业，而且严重波及实体经济，这与陷入困境的全球气候谈判一起形成了全新的国际战略

① [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8 页。

② 牛建英：《印度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资源与产业》2009 年第 5 期，第 138 页。

③ 姜克隽，胡秀莲：《中国的能源需求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载于杨洁勉主编：《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2 页。

④ Daniel Maliniak, Amy Vakes, Susan Peterson and Mickael J. Tierney, "Inside Ivory Tower,"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p.85.

⑤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UK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published by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03.

⑥ 庄贵阳、朱仙丽、赵行姝：《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4-287 页。

⑦ 关于本次金融危机的起点仍有争论，本文认为 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集团的破产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采用此时间作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起点。



环境。一方面，同时应对两大危机具有明显内在矛盾。首先，刺激经济增长需减少对能源消耗的限制，这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其次，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极大制约了低碳产业投资。但另一方面，低碳经济又是整合应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危机的有效手段，不仅能恢复经济、扩大就业，还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重要的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① 所以越早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越利于掌握未来国际竞争主动权。从这一点看，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能源危机的全球治理，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实际是助推各国发展低碳经济以治理全球能源问题的一次难得机遇。以此为契机，发达国家已掀开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序幕。

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际格局转型的根本性力量。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第一次科技革命缔造了英国霸权，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催生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新兴强国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缔造了美国霸权。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科技革命的本质实际是能源革命。“因此，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是否有国家（或非国家实体）拥有了可以挑战现行体制的能源链条或其中的某些环节。这包括新能源的发现、能源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能源应用技术的革命性进展、能源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经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国家对能源使用的控制力等。”^② 而这恰与低碳经济的实质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在金融危机初期财政明显恶化时，主要发达国家依然将低碳产业投资列为振兴经济的重点。如美国上任伊始的奥巴马政府就提出“绿色新政”，包括未来 10 年向可再生能源部门投资 1500 亿美元以创造 500 万个就业机会以及到 2012 年使美国电力的 10% 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到 2025 年将这一比例提升到 25%^③。在其 2009 年 2 月签署的 7870 亿美元救市计划中就包括对低碳产业直接投资的约 430 亿美元和相关领域减税的约 170 亿美元。在 2010 年 1 月向国会做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更明确表示，在清洁能源经济方面领先的国家必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而美国正是要成为这样的国家。^④ 在欧洲，欧盟于 2008 年 12 月公布了整合后的气候与能源政策，目标包括在 2020 年减少 20% 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并使可再生能源比例增加到 20%。^⑤ 为此，在欧盟 2008 年 11 月公布的总额 2000 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有 480 亿欧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2009 年 3 月，欧盟宣布对低碳经济领域投资 1050 亿欧元，以期成为低碳技术领域的世界领袖。^⑥ 成员国方面，英国政府早在 2008 年 5 月发布的《缔造一个低碳经济体：激发革新与技术进步》的政策文件中就指出，“建立一个低碳经济体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实现我们经济的转型，即一场能源消费方式的‘技术革命’。……政府决心使英国站在这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前沿，在改善我国和全球环境的同时，获得新增就业与经济机遇带来的收益。”^⑦ 金融危机伊始，英国政府进一步承诺通过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在未来 11 年使可

① 庄贵阳、朱仙丽、赵行姝：《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第 286 页。

② 于宏源：《权力转移中的能源链及其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30 页。

③ 美国政府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agenda/energy_and_environment/, 2010-01-28。

④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2010-01-29。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http://ec.europa.eu/climateaction/eu_action/index_en.htm, 2010-01-30。

⑥ 蔡林海：《低碳经济大格局：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第 9 页。

⑦ 英国布朗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文件：‘Build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Unlocking Innovation and Skills’，<http://www.defra.gov.uk/environment/business/commission/pdf/cemep-response.pdf>, 2010-01-28。



再生能源产业比现在扩大 10 倍,由此可形成最多 1000 亿英镑的市场并创造 16 万个新工作机会。^① 英国外相米利班德也表示,经济危机和气候危机必须结合一起解决,而商业行为应当在危机解决方案中发挥关键性作用。^② 此外,法国政府也拿出 340 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的 1/5 投入低碳产业,德国政府则拿出经济刺激计划的 13% 投向低碳产业。^③ 在日本,时任麻生内阁也提出总额 15 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一场“低碳革命”把日本打造成世界上顶级的低碳经济国家,具体措施包括到 2020 年使日本太阳能发电量提高到现在的 20 倍等。^④

目前,发达国家已形成在化石燃料低碳化、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化和低碳型服务四大领域的低碳经济竞争格局。其中,美欧之间更包含了意义深远的发展模式之争。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主义为基础倡导所谓“煤炭资本主义”(carboniferous capitalism) 低碳经济模式,主张新能源与化石能源共存与互补,并通过对前者的补贴逐渐降低能源价格实现低碳发展。而欧洲大陆国家则以“社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倡导“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模式,强调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和用新能源彻底替代化石能源。^⑤ 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获得未来国际竞争的相对优势。为此,发达国家还极力阻挠新兴大国获得核心低碳技术,以“绿色鸿沟”延缓国际格局转型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是最大的全球外部性问题,也是全球公共物品保护问题,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去解决,政府必须出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⑥ 所以政府应当主导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转让,以确保其规模和质量。但是,美国始终坚持市场机制应在技术转让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将此作为参与国际气候机制的先决条件之一。更严重的是,按照美国要求将三个灵活机制引入《京都议定书》实际上改变了已有的气候变化谈判框架,因为这极大削弱了《京都议定书》本来要求各国集中于国内减排的基本规范,^⑦ 使减排成为转移责任的手段。另一方面,尽管最后各方妥协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作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的主要途径,但发达国家转让的也多是机械设备和管理技术,对核心低碳技术尤其是研发技术转让仍做了相当程度保留。^⑧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还是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相对收益的精心考量,即面对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和自身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谋求更大经济技术优势以强化前者对自己经济技术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同时沉重打击其中石油输出国不断增长的权势,最终维持并巩固自身的国际政治主导权。这实际和欧盟与美国关于 WTO 技术壁垒的争论如出一辙,不过带有更深刻的战略竞争含义。因此,纵然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能使各方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仍然难以达成。

① 英国首相府网站: <http://www.number10.gov.uk/Page18026>, 2010-01-28.

② “G20 Leaders Must Sow the Seeds of Recovery in a Low Carbon Economy, Not Create the Next Bubble”, *Targeted News Service*, Washington, D.C., Mar 31, 2009.

③ Fiona Harvey, “Eco-groups fear an opportunity lost”, *Financial Times*, Mar 4, 2009.

④ 《麻生提出日经济发展构想》,《人民日报》,2009 年 4 月 10 日,第 3 版。

⑤ Matthew Paterson, “Post-Hegemonic Climate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1, February 2009, pp.149-151.

⑥ 邹骥:《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开发与转让国际机制创新》,《环境保护》2008 年第 5 期,第 17 页

⑦ Loren Cass, *The Failures of American and European Climate Policy: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Politics, and Unachievable Commitment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160-161.

⑧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靳云汇,刘学,杨婉华:《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环境技术引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24-28 页。



四、中国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可能贡献

由于巨大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同时存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协调型博弈”,其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分配性含义,即绝对收益能使各方倾向合作,但能否成功则在于收益分配的多少,即相对收益大小,因此彼此协调十分关键。^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程中,正是由于各方对绝对收益的关注才会有国际气候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但也由于各方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国际气候机制的有效性始终不足,属于典型的弱机制。古勒维奇认为,如果一项治理机制属于弱机制,那么诸如武力、宣传、劝说、领导技巧和经济杠杆等其他因素就会干扰治理结果。^②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恰逢国际格局深刻转型之时,这种“其他因素”的干扰就更加明显。

然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转型的重叠同样意味着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未来国际格局的主要竞争国,这就将气候治理中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紧密联系起来,二者的对立统一性也表现的更加明显,那就是绝对收益只能在相对收益的竞争中才能实现,否则二者都实现不了。在这里,能使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达成平衡的正是干扰弱机制治理结果的“其他因素”,其中大国政治的权力作用最为重要,而中国更因此可能做出关键贡献,这基于其同时存在的三重国家身份: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次,中国是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最后,中国具有积极地国际参与和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主观愿望。基于这三重身份,中国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可能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维持和创新现有国际气候机制基本原则的关键力量。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及其后续文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气候机制是目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保障,“对于将来应对气候变化外部性的任何举措都至关重要”,^③其基本原则就是各缔约方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发达国家为逃避责任目前普遍希望推倒《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建立一套更加“公平”的国际气候机制。但建立新机制的成本明显高于维持现有机制的成本,这就需要坚定的政治意愿维持现有机制以推动谈判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继续进行,而中国的贡献正在于此。由于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任何国际气候协议没有中国参与都无法达到实质效果,同时中国又是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拥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这就为中国提供了决定气候谈判成败的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希望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观愿望使其愿意承担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相应国际责任,这首先包括在维持现有国际气候机制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指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各国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成果,凝聚了各方的广泛共识,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必须倍加珍惜、巩固发展。本次会议的成果必须坚持而不能模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必须遵循而不能偏离‘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必须锁定而不能否定业已达成的共识和谈判取得的进

①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2页。

② Peter Alexis Gourevitch, “The Governanc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3.

③ John Marburger, “A Glob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Climate Chang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30, No.2, June 2008, p.51.



展。”^①正是在这一坚定政治意愿支撑下，中国才能推动《哥本哈根协议》达成，为2010年在墨西哥城的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打下基础。其次，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为获得低碳经济竞争的相对收益以谋求未来国际格局的有利地位，中国自主设立了2020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碳强度减排指标，这一“需要艰苦卓绝努力才能完成的目标”若能顺利实现，必将强化《京都议定书》中要求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的规范，并为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做出表率。最后，针对困扰《京都议定书》的责任判定问题，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人均碳排放计算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如果这一原则能够写入新全球气候协议，无疑是对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一大创新性贡献。^②

第二，中国是推动全球新能源技术转让的关键力量。首先，发达国家政府出于相对收益考虑不愿主导向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转让是阻碍国际气候机制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学者认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式是建立专门的政府间合作机构和机制负责技术资金转移工作，并“明确要求发达国家从公共财政研发预算、环境税收入（或能源税收入、碳税收入等）、在碳市场上拍卖碳排放权的收入及其他收入来源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建立发达国家公共财政主导的技术转让特别基金，作为政府促进和支持跨国技术转让的资金来源。”^③中国在实现这一机制创新方面的优势仍然是其能够决定气候谈判成败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决心以及争取低碳经济竞争相对收益的主观动力。正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要求下，谈判各方最终妥协在《哥本哈根协议》中写入设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减缓、适应能力和资金与技术转让的主体机构。^④尽管具体制度安排还需谈判，但这一表述已经朝政府主导技术转让方向迈出第一步，为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并行推动低碳技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提供了可能。其次，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决定了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基于自身科技创新寻求低碳技术突破，在事关未来国家生存发展和国际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获取相对收益。为此，中国政府已按照市场需求、经济效益和产业带动性为标准制定了以新能源为首的战略新兴产业科技发展规划，目的就是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⑤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极有可能使中国成为掌握众多核心低碳技术的发展中大国，打破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碳技术援助，实现低碳经济竞争格局的“南北均势”。这一“结构性”变化将从根本上突破目前国际气候机制内的技术壁垒，使机制建设朝着更加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是实现气候变化多层治理结构的关键力量。多层治理理论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欧盟决策机制。马克斯和胡格认为，欧盟内部的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

① 温家宝：“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9日，第2版。

② 关于人均排放标准公平性与正义性的详细研究可参见潘家华的一系列文章：潘家华：《人文发展分析的概念构架与经验数据——以碳排放空间的需求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5-25页；潘家华：《满足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及其国际公平与可持续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35-42页；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83-98页；潘家华、郑艳：《基于国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6-16页；潘家华：《碳排放与发展权益》，载于杨洁勉主编：《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第241-256页；

③ 邹骥：《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开发与转让国际机制创新》，第17页。

④ UNFCCC: *Copenhagen Accord*, http://unfccc.int/files/meetings/cop_15/application/pdf/cop15_cph_auv.pdf, 2010-02-01.

⑤ 温家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4日，第2版。



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① 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机制的一大问题是单一协议覆盖范围太广，涉及国家太多，利益协调极为困难。因此，“一个基于国家间、国家集团间和地区间的协议组合应当是国际气候机制的合理安排，这事实上也将增强全球性协议的效果。”^② 这种特定国家间多边和双边协议、区域性协议和全球性协议共存的状态正类似于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优势是起到了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作用，能有针对性满足合作方的专门需求，^③ 更好平衡治理中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目前区域气候治理的成功典范是欧盟，但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亚太区域的气候治理也有显著发展。首先，中国自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以来就积极参与其多边能源合作并努力实施有关能源倡议，已有效推动该组织在能源效率与节能合作、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合作、能源运输及基础设施合作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④ 其次，胡锦涛主席在 2007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 15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旨在通过信息共享、政策对话、能力建设、示范项目，促进亚太地区森林的恢复和可持续经营，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和生态功能，充分发挥森林在减缓气候变暖中的作用。该“网络”的功能是推动信息共享、促进实际合作、开展政策对话、增强能力建设。目标是促进区域内森林恢复，开展造林和再造林，为实现“2020 年之前达到 APEC 区域内各类森林面积增长 2000 万公顷”的目标做出贡献。^⑤ “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已于 2008 年 9 月在北京正式启动，为亚太地区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亚太区域气候治理的一大优势是集中了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同时又有多种合作机制并存，因此既能实现许多小范围气候治理组合，又能取得治理实效。由于国家实力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迅速增长，又是亚太诸多国际机制的重要成员，中国无疑将成为推动亚太地区气候合作和实现气候变化多层治理结构的关键力量。

五、结论

自 1988 年多伦多大会召开，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入国际政治视野已二十年有余，期间既有国际气候机制建立的巨大成就，也有围绕责任分摊的艰难博弈，这根源于国际政治中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矛盾作用。由于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恰逢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动最为深刻时期，这种矛盾更加凸显。其中，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绝对收益包括国际社会能减少全球变暖的生态威胁、获得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效益和金融效益三个方面，相对收益则包括为排放大国设定约束性中期减排指标可以影响国际格局转型时间和获取核心低碳经济技术可以掌握未来国际竞争主动权及有利的国际格局地位两个方面。但无论获得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大国政治始终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决定

① Gary Marks, Liesbet Hooghe and Kermit Blank,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the 1980s: State-Centric v. Multi-leve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4, No.3, 1996, p.372.

② Anthony Giddens,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p.220.

③ 樊勇明：《区域性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种理论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④ 许勤华，王红军：《亚太经合组织多边能源合作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2 期，第 35-38 页。

⑤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今天正式启动》，人民网，2008 年 09 月 2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810500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2 月 1 日）。



性因素，在当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转型高度重叠时期更是如此，但这也为寻求两种收益的平衡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国同时具有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主动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主观意愿三重身份，所以中国的大国政治作用极有可能为国际气候机制建设做出关键贡献。这包括维持和创新现有国际气候机制的基本原则、推动全球低碳技术转让和实现气候变化多层治理结构三个方面。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当前国际气候机制建设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将充满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博弈，这也是下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无论未来国际气候秩序形态如何，伴随大国实力和观念的不断增长，中国必将在这场全新的国际政治竞争中扮演核心角色。

（责任编辑： 陈永）



制度现实主义与制度制衡

——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崛起》

左超*

内容提要：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崛起》一书中，贺凯融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各自的优点，甚至吸取建构主义的部分精华，构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制度现实主义。该理论试图解释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制度化现象，假设在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的条件下，相关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制度制衡这种新的制衡方式，即各国努力通过倡议、利用和主导多边机制等方式来寻求安全。不过，这种解释能否合理有效地解释亚太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安全制度化现象还有待考察。本文遵循科学研究设计的路径，从问题的提出、假设的推导、变量的设置、因果机制的建立和假设的验证等几方面对贺凯的研究进行评述，最后还提出了这项研究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亚太政策所具有的启示。

关键词：制度现实主义 制度制衡 经济相互依赖 中国崛起

冷战结束不久，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曾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其中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做出悲观预测，认为随着美苏两极结构的瓦解，亚洲势必发生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但是，事实却与传统现实主义者的预测相悖，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并未发生激烈的国家间军事冲突，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多边制度安排，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组织规则建设上也不断取得进步，比如，东盟的扩大、东盟地区论坛的创立、“10+3”机制的制度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升级等等。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为何出现如此多的制度化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对于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局面有何作用？这些问题无疑是研究东亚国际关系的学者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新近出版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经济相互依赖与中国崛起》^①一书中，贺凯对传统现实主义关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解释和预测提出质疑，并将自由主义的经济相互依赖变量引入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创立了制度现实主义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全书严格按照科学研究路径进行理论构建和论证，变量选择简单有力，因果机制明晰，对亚太地区安全制度化这一问题提供了新颖而又合理的解释。

一、问题和假设的提出

贺凯之所以试图对亚太地区安全制度化现象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主要是因为既有理论无法对这一现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新现实主义曾预测，冷战结束后美国会从亚太地区撤离，从而导致该地区权力失衡，进而引发混乱和不稳定。但是，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挑战了新现实主义的悲观预测。冷战后，多边制度的发展是亚太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现象，

* 作者简介：左超，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09 级硕士研究生。

①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Routledge, 2009.



然而，制度在新现实主义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防御性现实主义试图弥补新现实主义对制度参与的解释不足。一些学者提出了“发言机会”（voice opportunity）和“捆绑”（binding）等假设，认为制度会被一些实力较弱但比较重要的国家采用，这样它们可以通过制度实现与大国的捆绑，进而增强自己在区域问题决策进程当中的发言机会。^① 贺凯认为，这也许可以解释东盟中的小国在地区制度建设中的积极态度，但不能很好地解释中、日这样的地区大国甚至美国这样的体系大国为何参与到地区性制度中。

与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在缓解安全困境和增加合作机会等方面的作用。一些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制度会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并改善信息质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做出可信的承诺，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利益偏好，建立协调的焦点，从而促进国际合作。^② 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支持。但是，1997 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暴露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缺陷，因为该理论无法解释“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制度能够改变国家行为，使国家从追求相对获益转向追求绝对获益？”^③

一些建构主义的学者认为，“认同而非物质因素使世界走在一起”。^④ 在温特（Alexander Wendt）看来，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塑造利益。^⑤ 按照这种观点，国家社会化进程以及集体认同的构建会促进地区共同利益的实现。比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东盟方式包含的协商、一致同意、非强制、和平解决、主权绝对平等等一系列原则和规范可以看作是“当代东南亚国家建构地区认同的一种努力”。^⑥ 但是，面对 1997 年的经济危机，东盟国家并没有迅速达成集体应对方案，而是任由危机肆虐。可见，东盟的集体身份并未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

由此看来，利用单一理论来解释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制度现象存在诸多不足。贺凯注意到，一些学者试图运用工具箱方法整合一些特定理论，以建构新的解释框架。例如，谢尔登·西蒙（Sheldon Simon）提出了双轨战略以嫁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威廉·托（William Tow）提出了整合安全路径，试图整合现实主义/双边主义和制度主义/多边主义；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和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发展出一种折中主义路线，对理性主义的物质变量和建构主义观念变量进行综合。^⑦ 贺凯认为，这种试图综合两种或多种理

① Joseph Grieco, "The Maastricht Treaty,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the Neo-Realist Program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1, Spring 1995, pp. 21-40;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pring 1999, pp. 42-63. 转引自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5.

② 关于制度功能的探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五、六章。

③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6.

④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855-885.

⑤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1 页。

⑥ 有关东盟地区认同构建的论述，参见[加]阿米塔·阿查亚著：《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一、二章。

⑦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p. 8-9.



论的解释路径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有可能陷入宏理论的幻想。^① 在批判地借鉴工具箱式的方法的基础上，贺凯综合现有理论的合理要素和优点，同时兼顾了理论的抽象性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构建出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以解释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制度化的问题。

对于“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制度制衡’战略以面对体系压力”这一核心问题，贺凯提出了两个假设：第一，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促使国家选择制度现实主义的制衡战略，而不是传统的军事联盟制衡战略，以应对来自体系的威胁和压力；第二，地区体系内的实力分布指导国家如何实施制度制衡，即选择包含性的制度制衡还是排外性的制度制衡。^② 根据“有限理性”的成本-收益估算机制，决策者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感知越强烈就越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战略。

贺凯分析了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权力分布结构下的制度制衡状况（图-1）。^③ 在单极体系下，制度制衡受制于霸权国，中小国家没有发言权；在两极结构下，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制度制衡，其他国家的参与仍然有限；而在多极体系下，制度制衡成为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共同选择，但是大国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制度制衡的一个必要条件，制度现实主义并不排除国家采取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制度制衡也并不意味着和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用制度斗争代替了军事冲突。

图-1 极、相互依赖与国家制衡

制衡		经济相互依赖	
		弱	强
权力分布	单极	权力制衡（霸权和殖民地战争）	制度制衡；排外性（霸权和其它国家）
	两极	权力制衡（两大集团之间）	制度制衡（两个超级大国领导）
	多极	权力制衡（战争的高度可能性）	制度制衡；包含性（把目标国约束在制度内）

二、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

制度现实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的融合，该理论将制度这一维度加入到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概念中，并且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相互依赖这一变量来解释国家为何采取制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该理论还引入建构主义的非物质变量——领导人对体系变量的“感知”，将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成为架起经济相互依赖（自变量）与制度制衡（因变量）之间的桥梁。当然，贺凯的研究并不是对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几种范式的核心变量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了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正如

①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January 2000, pp. 3–33.转引自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9.

②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9.

③ Ibid., pp. 10-14.



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说，“我们应该打破人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营垒的学术边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张，都应该与这种无意义的朦胧进行斗争”。^① 贺凯的研究尝试性地架构起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沟通的桥梁，揭示了两大范式间可能存在的通约性。

从研究设计的角度看，贺凯的研究在核心概念厘定、变量的引入和操作化、因果机制的建立和案例选择等诸多方面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第一，对制度制衡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和分类。按照新现实主义的主张，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主要行为是制衡，尽管有时也有追随、推诿等行为。一般而言，制衡的手段可以分为硬制衡和软制衡。^② 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认为，软制衡主要涉及国际制度、外交和经济领域，它不同于硬制衡所强调的军事合作和结盟政策。为了达到拖延、阻挠和破坏霸权国政策效果的目的，制衡国可能采取诸如利用国际机制进行否决、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拒绝向霸权国出让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等方式对霸权国进行制衡。^③ 保罗（T. V. Paul）等学者也认为，软制衡涉及一些心照不宣的非正式结盟的制衡行为，建立在诸如有限的军事建设、合作经历或者区域和国际制度协调等行行之上。^④ 贺凯提出的制度制衡这一核心概念脱胎于与软制衡相关的研究，他把“国家通过多边制度来实施的制衡行为”定义为制度制衡，并将其分为包含性和排斥性两种方式。^⑤ 其中，“包含性的制度制衡”是指在多边制度框架下，国家参与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以限制（本区域内）他国的行为，控制并主导议程以关注与本国利益相关的议题；“排斥性的制度制衡”则指有关国家协调它们的政治经济以联合抵御区域外大国的压力。^⑥ 这样的界定和分类为深入讨论国家选择何种制衡方式奠定了基础。

第二，本研究通过引入经济相互依赖这一变量为制衡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并且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严格的测量。作者没有采用脆弱性与敏感性来衡量相互依赖，也没有把相互依赖按照均等依赖、绝对依赖和不对称依赖的标准进行分类，而是用贸易量和接受对外直接投资两个主要指标来衡量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⑦ 在关于中国的案例中，作者通过对比改革开放之前的自给自足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对外依赖，从对外贸易量、外贸占 GDP 总量的比例、接受对外直接投资等三项可观察指标进行考察，得出了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外经济依赖的程度处于很高水平的结论，^⑧ 并进而认为中国对外制衡方式的选择受到经济相互依赖的决定

① 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 *New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p. 301-338. 转引自门洪华:《构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载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译者前言部分第 33 页。

② 关于“软制衡和硬制衡”理论的论述,参见 T. V. Paul,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8; 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③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p. 36-38.

④ T. V. Paul,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p. 3.

⑤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10.

⑥ Ibid., p. 10.

⑦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11.

⑧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chapter 2.



性影响。对外经济依赖的加强增加了有关国家对外采取军事制衡的成本和代价,使得相关国家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考量而不敢贸然采取传统的军事结盟等制衡方式。作者还着重论述了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美国对中国的优势、中国对东盟的优势、日本对中国和东盟的资源依赖以及东盟对日本的资金依赖等不对称依赖对于各国选择制衡方式的影响。

此外,贺凯还用军事开支和政府预算两项可量化指标来计算体系内国家间实力分布情况。^①为了测量观念这一干预变量,作者还采用了文本分析方法,从领导人的公开言论讲话、外交档案以及决策过程回忆录等文本中提取出了领导人的感知因素这一非物质性干预变量,从而使我们可以明确领导人对体系实力分布和经济相互依赖这两个体系层次自变量的感知的变化。

第三,选择了具有代表性和可比较性的案例加以理论检验。^②一位学者在评价贺凯的这项研究时认为,其研究的贡献首先要看安全制度化是亚太地区所特有的还是冷战后的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如果是前者,则比较有意思,为什么单单亚太地区会出现安全制度化?若是后者,这项研究的价值还不甚明晰。^③实际上,作者选取案例既是议题导向的,也是理论导向的。^④“亚太地区的安全制度化趋势”这一经验问题和“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会采取制度制衡战略”这一理论问题直接框定了作者的案例选取范围。在崛起中的中国、全球性的霸权国美国、地区性的大国日本、区域内的中小国家(东盟)等四个案例中,各个层次的国家都包含在内。与此同时,作者还通过案例内部的过程追踪,进行了同一案例的纵向比较,从而探索出制度制衡的因果机制。例如,在美国的案例中,作者分别对比了上世纪90年代前期和后半期、“9·11”事件前后美国对东亚多边制度的不同态度和参与程度,认为美国实力下降时更倾向于参与多边制度以实现自身利益,反之则对多边制度持冷漠态度。^⑤

三、制度现实主义的局限

尽管贺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新视角,但制度现实主义这一解释框架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理论构建的内在缺陷。贺凯构建的理论与其说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如说是对外政策理论。虽然作者的两个主要自变量都是体系层次的,但在中国、美国、日本以及东盟的案例验证当中,作者主要分析的是国家的对外决策,而自变量变成领导人基于体系变量变化进行理性评估之后形成的“感知”。由此来看,作者的理论检验并没有对应研究设计中的结构层次,而是调整到单元层次上,认为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利益追求和领导人对体系因素的感知和估算决定了国家的行为选择。同时,既然是分析对外政策选择,作者也明显忽视了行为体

^① Bo Hu, “Book Review: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4, December 2009, pp. 327-328.

^② Bo Hu, “Book Review: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pp. 327-328.

^③ Bo Hu, “Book Review: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pp. 327-328.

^④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161.

^⑤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chapter 3.



的内部特征。比如，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由体系变量决定的，还有变化中的偏好因素也应考虑在内，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就限制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中国传统的睦邻政策也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影响。^① 同样，在考察冷战后美国的行为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国内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

第二，对关键变量“经济相互依赖”的论述和解析严重不足。作者并未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标准进行细化或者更为详细的区分，只是笼统地将其分为强或弱两种类型，而这种强弱程度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的感知，量化不够彻底；另外，将其简化为两三个可观察的指标，与现实中情况相差甚远，有脱离现实的危险。当然，任何一项关于经济相互依赖的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其量化指标，但是只用贸易量、接受对外直接投资等两三个指标未免过于简化经济相互依赖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作者也没有对这几个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层级划分，过于笼统。

第三，作者夸大了多边制度在亚太地区和平中的作用，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不可否认，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的和平因素是在增加，东盟、“10+3”机制、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一些制度化安排起到了一定的对话和协调沟通作用。但是，这些安排涉及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议题，对安全议题的贡献并不是太大。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十分复杂，解释此地区的安全问题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安全现状显然不是多边制度运作的结果，而是军事对峙的结果，一些实质性的安全问题依然取决于相关方的硬制衡手段。此外，一些相关国家所采取的内外政策也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起到了极大的缓和作用。例如，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所采取的“韬光养晦”战略，积极谋取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激化此地区的安全局势，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金大中执政时期韩国对朝鲜实施的“阳光政策”对半岛安全局势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亚太地区许多经济性质的制度安排对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仍然有限，最主要的还是背后支持这些制度安排的国家尤其是体系大国。斯蒂芬·A. 考克斯（Stephen A. Kocs）在评价贺凯的研究时认为，“把这些制度制衡行为称为‘制衡’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把通过遵守规则实现的安全与通过威慑实现的安全混为一谈，尽管这些政策选择的国际政治动力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② 可见制度制衡的效用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四、对中国亚太政策走向的启示

上文主要对贺凯研究的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最后对其研究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作一简要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几乎所有的规律都是概率性的，^③ 但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还是具有极大的预测功能，一种成功的有关制衡的、与外交政策选择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会给我们的对外政策指明方向，这也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制度现实主义保守地分析和预测

① Bo Hu, "Book Review: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pp. 327-328.

② Stephen A. Kocs,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Book Review]," *The China Journal*, No. 62, July 2009, pp. 217-218.

③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了制度制衡在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向，对亚太地区局势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贺凯认为，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也许不能改变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但它们毕竟给相关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择，采取制度制衡可以降低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和亚太地区的制度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亚太国家把制度制衡作为一种在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安全的对外政策选择的合理性。^①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经济相互依赖因素在亚太地区制衡地图上的重要作用，学习各国对经济相互依赖这一体系因素的利用经验。经济相互依赖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增大我们在地区问题上的话语权，但同时，相互依赖不对称性的加剧也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如中国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就严重限制了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政策选择，而美国则利用不对称优势的存在，处处刁难甚至威胁亚太各国。

其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保障作用。贺凯在书中提到一些学者关于中国为何采取制度制衡的四种解释，分别是：新俾斯麦再保证战略（neo-Bismarckian reassurance）、虚伪的修正主义策略（deceptive revisionist tactics）、华夷秩序圈（the Sinic zone of influence）、能动者导向的社会化（agent-oriented socialization），^② 其中前两者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分析倾向，侧重国家对外决策的理性分析，而后两者则基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别从古代华夷秩序的等级秩序观和国家社会化进程的角度解释冷战后中国对多边国际制度的态度转变。尽管以上各种分析各有不足，但是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不管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化、国际化战略来说，我们都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多边制度在互信建设、稳定合作预期、降低合作成本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利用这种多边国际舞台，制衡美日，缓解东盟各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

第三，我们也不能“自废武功”，过分沉迷于所谓的制度制衡。我们既要重视制度制衡，但更要注重传统的均势制衡，加强硬实力的发展和积累以增强自己在体系中的话语权，清醒认识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和冷战遗留问题。不管亚太地区的和平态势有多么乐观，我们的对外政策决不能建立在“对国际政治的一些客观准则和基本规律的误解之上”，^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今年六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上，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又一次暴露无疑，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战略绝不会因为经济相互依赖、制度制衡的存在而轻易放弃，虽然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角度来说，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不应该继续过去数百年的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逻辑；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必须承认，中美在 21 世纪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同时，恐怕尚无法完全摆脱陈旧大国政治的逻辑，当然也跳不出无政府状态的羁绊，尤其是美国绝不会放任中国崛起，更不会轻易放弃其全球主导地位。

（责任编辑：刘明）

①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 159.

②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p. 149-152.

③ 张睿壮：《“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 期，第 68-72 页。

约翰·J·米尔斯海默



约翰·J·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是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温德尔·哈里森杰出贡献 (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政治学教授, 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学术历程: 1946 年出生于美国, 1970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West Point), 随后在美国空军服役五年, 在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攻读政治学并于 1980 年取得博士学位。在 1979-1980 学年米尔斯海默在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担任研究员, 1980-1982 年间在哈佛大

学国际事务中心 (Harvard University'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做博士后。1998-1999 学年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担任惠特尼谢泼德森院士 (Whitney H. Shepardson Fellow)。米尔斯海默从 1982 年起, 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研究领域: 米尔斯海默的研究集中在安全领域, 同时也涉及一些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问题。米氏先后写作或与他人合作了五本著作, 发表了七十余篇论文。近期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国际政治中的谎言, 未来还将对民族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研究。

主要著作: 《领导人为什么说谎: 国际政治中谎言的真实性》(2011)、《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2007)、《大国政治的悲剧》(2001)、《核威慑》(1985)、《常规威慑》(1983)。

PS:

第一关键词——西点军校

约翰·米尔斯海默于 1947 年 12 月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 8 岁时举家搬迁至纽约的韦斯特切斯特县。如果说出生于冷战初期为米尔斯海默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时代背景的话, 那么在西点军校四年的学习对于其后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思考问题的视角。他于 1965 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 一年之后他面临着两个选择: 要么进入西点军校深造, 要么赶赴越南战场。米尔斯海默最初想去越南参战, 后来在父亲的劝说下他选择了西点军校。从他现在的成就来看, 也许他应该感谢当年父亲的劝说。

在西点军校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米尔斯海默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西点军校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学者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 世界闻名的西点军



校纪律严明、要求严格、训练苛刻。于是，在这儿他学会了经受磨难，“永不放弃”、“全力以赴”的军规练就了他在逆境中奋斗的品格。这些经历和体会在他面对学术研究的困境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促使他努力克服面前的困难，勇往直前。其二，西点军校“不得撒谎和欺骗”的学员荣誉准则培养了他实话实说的好习惯，因此他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不会受到人们的喜欢。这也为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时敢于畅所欲言、发表异于其他学者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米尔斯海默说，在西点军校的那几年（1966—1970）是相当艰苦的，不仅仅是指训练的难度高、强度大，更是在美国介入越战的动乱时代，他作为一名军人的承受很多来自国内的反战压力。他圣诞或者暑假回家时都会被反战的激进分子当做敌人对待。以往每年春天去纽约市第五大道列队游行对于西点军校的学员们来说是件荣耀的事。而当他们在1968、1969、1970年的“军人节”于纽约第五大道游行时，路旁聚集的人们将心中对越战不满的情绪以将一袋又一袋的猪血或尿液砸向他们的方式发泄出来，以至于后来军校学员们得为应对此种混乱局面做演习。

第二关键词——进攻性现实主义

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悲观的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是大国之间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在东亚需要扮演离岸制衡手的角色，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美国应当遏制中国。米尔斯海默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发言人。

米尔斯海默于2010年8月4日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第四届迈克尔辛年度政策讲座（Fourth Annual Michael Hintze Lectur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发表了题为《酝酿中的风暴：中国对美国在亚洲权力的挑战》的演讲。这一演讲明确的阐述了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并且论及了米氏对中美澳关系的看法。

在讲座中，米氏认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强大军力，并充当着调停者的角色，中国的崛起对这一体系产生了冲击。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米氏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米氏首先反驳了看待中国崛起的三种看法，即中国能够通过向外界宣传其和平发展的意图以减少外界的恐惧、中国能够通过发展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以表明一个无危险的中国有益于世界和平、中国一贯采取的睦邻政策会产生路径依赖使其沿着和平轨道发展。针对这些观点，米氏认为，一国的意愿无法被证实，即使中国现在不具有称霸意愿，并不代表其以后也不会有；而防御性的武装力量与进攻性的武装力量之间越来越难以界定；一国的政策具有变化性，过去不等于未来，领导层的变更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政策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东亚地区，中美两国都具有进攻的能力和对方未知的意图。一国确保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变得比他国更强大，因此，任何大国都希望成为体系霸主，然而，因为巨大的空间距离



对力量投送的限制使得全球霸权成为不可能，大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区域霸权并且阻止其他区域的国家成为霸权国，这就是美国在东亚所要扮演的“离岸制衡手”角色的目的。当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必然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霸权，而美国也不会容忍中国的崛起，因此中美冲突难以避免。

鉴于讲座举办于澳大利亚，米氏特别提及了未来的中美澳关系。米氏认为，中国的邻国将认识到并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权力的增长，澳大利亚必将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并将寻求与美国的结盟，成为美国打造的遏制中国的联盟的一部分。

后记

米尔斯海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含有浓厚的“美国例外论”色彩，其“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更使得他引起广大国人的关注。然而，经过观察与接触，人们会发现米尔斯海默教授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鹰派”人物，而是一个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的教师、在理论上固执己见的学者、在商店里为孩子购买玩具的父亲。对于大众对他的“中国威胁论”代言人的印象，米尔斯海默辩解道：“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带任何感情或意识形态的色彩，只是从理论的角度预测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一位学术作风严谨的学者，因为学术观点而被归为“中国威胁论”的代言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希望通过对其人及其学术的深入接触，国人能够对米尔斯海默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了解。

（责任编辑：姜忆楠 任娟）

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

【编者按】2010年11月16日，应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刘丰老师的邀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林民旺老师在二主楼A408为2010级国际关系系硕士生做了一场题为“崛起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的演讲，林老师在讲座中详细地介绍了他最近完成的研究《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在文中，林老师区分了国家声誉与国际威望、国家形象和可信度等概念，认为国家声誉是其他行为体对某国类型的判断和认知，并总结了三个流派对于国家声誉如何形成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林老师提出了一个分析崛起国如何塑造并改变声誉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案例检验了这一理论。林老师渊博的知识和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讲座结束后，林老师又特意将自己的研究论文发给《新视界》编辑部供南开学子交流。本期“学术讲堂”将带您一同回味林老师的演讲，感受大国声誉的塑造与变迁。



主讲人：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时间：2010年11月16日 18:30-20:30

地点：二主楼A408

主讲人简介：林民旺，1979年生，福建南平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2003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外交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兴趣是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决策等；

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美国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论坛》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专著有《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规范社会化的视角》；译著有《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战略经济学》、《重获企业精神》、《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第二世界》等。

国际政治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尽管国内政治中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最高权威和公共权力的存在，能够提供对其他行为体的未来行为的稳定预期，进而缓解“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消极结果。然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却无法有效地缓解“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境。尽管各个理论流派对于“不确定性”的理解存在诸多差异，

① 但是从总体上看,根据唐世平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不确定性”的维度归结为两个方面:内部维度与外部维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维度主要指的是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的复杂性,而内部维度主要指的是对其他行为体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的不确定。^②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国家并非都得对彼此怀有敌意。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它们不可能确信这一判断,因为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另外,意图稍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因此,意图的这种非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③

由于行为体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只有自己才了解,这是其他行为体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因而导致了其他行为体只能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决策,不得不面对决策的风险。为了降低决策中的风险,行为体常常依据可以观察到的结果来推断其他行为体的类型(Type),以此来解释其行为的原因,进而希望能够化解决策中的风险。因此,对某国类型或者特征(character)的一种判断就能够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影响国家间的互动结果。



这就是国家声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所谓国家声誉,指的就是其他行为体对于某国类型的一种判断。在国际政治的互动中,其他行为体可以据此判断做出自己的应对。

声誉是国家值得为之而战的为数不多的因素之一。^④良好的国家声誉能够给国家带来积极的收益,而不良的声誉则常常可能导致非本意的结果。因此,国家声誉构成了一个国家重要的权力资源。早期的思想家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国家行为中的声誉动机。修昔底德在描述雅典人试图拓展和保护他们的帝国时写道:“我们没有什么过分之举,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追求安全、荣誉和利益。”^⑤近代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思想家都提出了类似的

① 国际关系的各个理论流派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现实主义将“不确定性”理解为无政府导致的生存恐惧;理性主义则认为是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次优结果;而认知主义则理解为复杂环境下决策的混乱状态。具体可见 Brian Rathbun,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Clarifying a Crucial Concept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3 Sep. 2007, pp.271-299.

② Shiping Tang,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To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Attribution in IR,” Paper presented at 2009 APSA Annual Conference, Toronto, Canada, Sept. 3-6, 2009 pp.1-41.

③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

④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p.124.转引自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转引自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观点：国家声誉是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

国家声誉之所以重要，正如霍布斯所言，“权力的声誉也是权力”。^①换言之，良好的国家声誉能够增进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思想中可以得到体现，尽管他们经常使用的是另一些词汇——国家威望（prestige）、荣耀（honor）、形象（image）和可信度（credibility）等。汉斯·摩根索将所有的国际政治归结为三种基本模式：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他认为，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寻求的是为维护或增加权力而显示它所拥有的权力，则该国奉行的就是威望政策。^②威望政策的目的是，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它自认为拥有的权力，或想使别人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通过威望政策，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对自己权力的估计，由此达到保持自己盟国的忠诚、削弱敌对盟国的团结，赢得中立国家的支持。^③



忠诚、削弱敌对盟国的团结，赢得中立国家的支持。^③

罗伯特·吉尔平也注意到，国际关系中的威望与国内政治中权威的作用具有同等功能。犹如权威是国内社会命令中心这一特征一样，威望(而不是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卡尔指出，威望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的实力受到承认，通常你可以在不使用它的情况下就实现自己的目标”。国家之间的交易及其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参与各方相应的威望。^④由此可见，无论权力还是威望，其功能都是要保证该体系中较弱小的国家服从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或那些国家的领导。^⑤

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无疑都指出，声誉(或者威望)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关键的作用在于能够增进权力。与他们略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基欧汉则认为，声誉带来得是更多的国际合作与收益。正如他所言，良好的国家声誉对于国家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不确定性和非集中化的条件下，政府决定和谁、以何种条件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参与者信守诺言的意愿和能力的预计。而良好的声誉使得政府易于加入可从中受益的国际机制；而那些声誉不佳者则要付出难以达成协议的代价。^⑥同样，由于追

① 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第40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③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10页。

④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⑤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0页。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信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求国家声誉的动机的存在，行为体也能够表现出其他的合作行为。基欧汉指出，即便当自身短视利益提醒自己不要去执行国际机制时，利己的政府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并且因为害怕报复以及形成坏的先例，它们仍然会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原则。^①

总之，国家声誉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声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于崛起中的国家而言，良好的声誉是一项尤为宝贵的权力资源。然而，国际关系学科对国家声誉的理解和认识却存在不少混乱之处，对于国际政治中是否能够形成声誉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因而，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国家声誉的研究作一总结，以理清国家声誉的概念，把握当前的研究现状。同时，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以理解崛起中的国家如何能够塑造良好的声誉，以及声誉发生变化的机制。全文分三个部分，首先从概念上辨析何谓国家声誉，并梳理总结国家声誉研究的三个派别。其次，提出一个国家声誉形成和变化的理论框架，以此理解崛起中的国家如何进行声誉塑造和变化；再者，本文将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声誉的形成进行较为细致的案例分析，以印证理论的基本框架。最后是全文的结论，提出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

一、国家声誉的研究

（一）国家声誉：概念的界定

正如上文所述，早期的思想家们早就对国家声誉问题进行过初步的阐述。然而，这些认识多半只是生活经验和历史直觉的总结和体悟，谈不上是深入、系统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采用了与国家声誉的概念比较接近的词汇，诸如国家形象、国家威望和可信度等词汇，由此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和混乱。要使用国家声誉这一概念之前，首先要清楚地界定它的内涵。^②

国际威望。按照吉尔平的观点，国家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威望主要是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当代战略理论认为，威望包括一个国家权力的可靠性，以及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遏制或胁迫其他国家的意愿。^③一定意义上说，威望与权力的概念非常相近。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界定的，权力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社会关系内的行为者将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尽管这样做会有阻力，也不论这种可能性的依据是什么，事情都将如此”。威望则是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具有一定的特殊内容的命令将为一定的人群所服从。”^④可见，威望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没有相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不可能拥有相当的威望。同时，威望与权力又存在差别。威望必须具有一定的道义和功能的基础。对一个强国而言，国际威

① 基欧汉：《霸权之后》，第129页。

② 对于概念的界定，一般有三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比较近似概念的内涵，以此凸显所要定义的概念的真正内涵；一种是通过找出该概念的相反概念，从而使其内涵得以明晰；第三种方法是通过比较与之相互补的概念，以此使其概念内涵更为凸显。参见 Barry Buza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16

③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1页。

④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0页。



望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这个强国在最近的霸权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能力；二是这个强国能够提供某种“公共产品”；三是这个强国可望在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国家的支持。^①

在吉尔平看来，国家威望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成功地使用力量，尤其是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加以实现的。只有通过战争的较量，才能确定国家的国际威望的层次。^②相反，摩根索认为，一国的威望不是由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所采取的特定行动的成败来决定。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国家的品质和行动、功业和败绩、历史遗产和愿望的综合反映。国家的威望则酷似银行的信用。一些强国即便遭受失败或放弃显赫的位置也不会蒙受威望上的损失。^③

国家形象。所谓形象，指个人或者集体对其物理和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评价或者知觉，主要来自心理的认知和建构。因此，形象常常具有与现实相分离的成分。^④而所谓国家形象则指，“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构成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⑤杨伟芬教授的定义则更为精练，把国家形象定义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⑥

国内学者对国家形象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从营销、媒体传播的角度研究了如何构建形象。^⑦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大而化之的嫌疑，很少有学者对形象进行细致的研究，例如没有阐明究竟都有哪几种国家形象？每种国家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形象的形成机制）？形象又是如何改变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也仅仅强调应该多多开展公共外交、广泛的媒体覆盖等大而无当的政策建议。当然，也有少量的学者也注意到，国家形象的塑造要迎合受众的心理和认知的模式。但是却并没有对受众的心理和认知模式进行深入分析。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⑧

国家形象的研究之所以没法取得学理意义上的进步，追根究底在于这一概念不是一个恰当的学术概念。由于它的内涵广泛，指涉的是对国家的总体评价。而国家的行为包含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假设一个国家可能在经济领域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在政治领域的评价却并不高，我们如何能够加总得出一个“总体评价”呢？因此，国家形象的概念无法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压缩国家形象的概念定义，从而可以加以进行学理研究。然而，压缩后的定义就与下文的国家声誉概念没有任何差别了。

可信度（credibility）。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将威胁的可信度界定为，对于威

①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3页。

② 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3页。

③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19页。

④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ha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nguin Books, 1998, p.240,329,430.转引自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第45页。

⑤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2页。

⑥ 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⑦ 如胡晓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理论·现实·路径》，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

⑧ 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关系中形象的逻辑》是研究国家形象问题的里程碑似的著作，然而这一著作却没有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参见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胁是否被执行的可能性的感知。^① 一般而言,可信度指的是承诺是否执行的可能性的知觉。一个威胁或者允诺是否可信,完全取决于他者的知觉。^② 因此,可信度是一个关系型的概念。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认为可信度是由决心、能力和利益构成的。这种定义采用了非关系型的概念——决心来定义关系型的概念,因此被唐世平教授批评为是不恰当的。他认为可信度由权力的知觉或声誉、利益的知觉和决心的声誉构成。在任何特定的情势下,一个行为体的可信度是另一行为体对这三个因素的综合评估。^③ 这样,国家声誉就只是成为了可信度的一部分。

国家声誉是指国际关系中,其他行为体对于某国类型的一种判断。它与国际威望、国家形象和可信度之间既存在相关性,同时也存在差别。一个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家也一定具有很高的国际威望、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及行为的可信度。然而,国际威望却并非所有国家都能获取的产品,只有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才可能享有如此的资格,而良好声誉的获得却是对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实力并不强大的国家也可能获得很高的声誉。国家形象的概念和国家声誉最为接近,都是指“国际社会对一国的判断”,通过压缩国家形象的内涵,将其定义为“国际社会对一国类型的判断”则含义等同于声誉。国家声誉构成了可信度的一部分。国家的可信度不仅取决于其兑现承诺、实施威胁的决心的声誉,也取决于其能力和利益所在。

(二) 国家声誉的形成:三个流派的辨析

既然国家声誉如此重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声誉又是如何形成?如何变化呢?国际关系的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是“过去行为论”(past actions theory),认为一国遵守或者违背过去承诺的历史行为会影响其国家声誉的形成,主要人物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安妮·萨特里(Anne E. Sartori)等。^④ 这一流派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遵守或者背叛过去承诺的历史记录将会影响其可信度(声誉)。如果一个国家总是背叛过去的承诺,那么将会导致其声誉降低,而一个国家如果总是遵守承诺,将会提升其国家声誉。^⑤ 这一观点的逻辑基础谢林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逻辑基础来对此进行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过去行为能够透露出关于一个国家类型的私有信息。^⑥ 例如,国际危机中总是采取妥协的国家,则容易被认为是懦夫,因为这种行为透露出其实力不足或者缺乏决心的特征。

① Daryl G.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64.

②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5, p.17.

③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14, No. 1 January-March 2005, p.38.

④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ne E. Sartori, *Deterrence by Diploma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王学东的研究接受了这一流派的结论,认为过去的历史行为是国家声誉形成的决定因素,而国际制度能够将国家的履约情况(声誉)更为容易地为其他行为体所知。参见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在笔者看来,王的这一研究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对于历史行为为何会形成国家声誉,并没有给出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⑥ Daryl G.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p.12.



“过去行为论”很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知觉,真实地描述了日常生活中声誉形成的机制。然而,这一理论是否适合国际政治呢?许多研究并没有发现过去行为和国家声誉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学者们对于这一结论也并没有形成共识。^①

第二个流派是“当下算计论”(current calculus theory),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国家声誉是无法形成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达里尔·普雷斯和唐世平等。他们都认为,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导致了国家声誉的无法形成。由于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执行规则,国家的行为关系它的生死存亡之道,因而国家领导人不会向日常生活中的决策那样,采取简单的历史启发法,先验地假定敌人会像过去一样地行为。相反,领导人会抛弃简单的启发推理,会收集更多的信息,进行更严肃认真的分析,并且总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对情势进行评估,由此国家的历史行为形不成声誉。^②同时,也由于没有任何两个国际事件是足够相似的,使领导人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对手的去行为是未来行为的指导。概而言之,国际事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排除了领导人决策中诉诸历史的可能性,而是就事论事(case-specific position)。国际危机中威胁的可信度取决于利益和实力,而不是声誉。

“当下算计论”有很强的逻辑基础,并且也得到了不少案例分析的证明。然后,这一理论目前只证明了适用于高度冲突的危机中,^③并不代表着在其他领域国家也无法形成声誉。事实上,在不少国际领域内,声誉的形成事实上是存在的。^④

表-1: 默瑟关于国家声誉形成的四个假设

	盟友	敌人
坚持立场	形不成声誉	形成“有决心”的声誉
让步	形成“没有决心”的声誉	形不成声誉

注: 引自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7.

第三个流派是“有限的承诺依赖(qualified-interdependence-of-commitments)”^⑤,认为国际政治中声誉是可以形成,但是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够形成声誉,主要的代表是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和迈克尔·汤兹(Michael Tomz)。这一流派认为,国家声誉形成的机制既需要考虑国家的行为,也要将行为的背景纳入考虑。由于下文借鉴的是迈克尔·汤姆的理论框架,因此这里近介绍默瑟的理论。默瑟运用了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研究国际声誉形成的问题。他认为,团体间关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我们倾向于使用属性归因(character-based attribution)来解释异族(out-group)的不合意(desirable)行为,而趋向

① Daryl G.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pp.15-17.
 ② Daryl G.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pp.20-24.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38.
 ③ Daryl G.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 p.164.
 ④ Paul K. Huth, "Deterr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1999, p.34.
 ⑤ Paul K. Huth, "Deterr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p.34.



于以情势归因来解释它们的合意行为。^① 对于一种行为是属于合意行为还是不合意的行为，关键取决于团体间的关系。这样，根据归因逻辑，就可以得到关于国际危机中国家声誉形成的四个假设，见表-1。这一流派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来的国家声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国家声誉不仅是国家行为导致的，还与背景因素息息相关。总而言之，思想家、理论家们对于国家声誉概念的理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不同之处，总结见表-2：

表-2：国家声誉近似概念的比较

概念	内涵	形成的基础	形成的机制	概念类型
国家威望	国家实力及使用实力的意愿	权力的成功使用 综合国力	Gilpin: 战争的结果塑造 Morganthau: 综合因素的作用	属性型概念
国家形象	对国家的总体评价和认定	综合国力	媒体的建构和自我的行为展示	关系型概念
可信度	承诺是否执行的可能性的知觉	对能力、利益和决心的知觉	1、内在的可信度 2、外在的可信度	关系型概念
国家声誉	对某国类型或者特征判断	对国家类型的知觉和认知	1、前后行为的一致性 2、无法形成声誉 3、人的认知模式：归因理论	关系型概念

来源：作者自制。

同时，对于国家声誉如何形成，三个流派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见表-3。

表-3：国家声誉如何形成：三个流派的比较

流派	核心观点	代表人物	研究路径	优缺点
过去行为论	历史行为塑造国家声誉	托马斯·谢林	理性主义	缺乏理论的逻辑基础
当下算计论	国际社会无法形成声誉	达里尔·普雷斯	理性主义	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但只适用于利益高度冲突的领域
有限的承诺依赖	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形成声誉	乔纳森·默瑟和迈克尔·汤兹	心理学\理性主义	符合现实，且具有严格的理论逻辑

综上，通过对相近概念的辨析，国家声誉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的明晰。同时，通过对既

^①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45.



有文献关于国家声誉如何形成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的深入理解。下文将对崛起国的声誉塑造问题提出一个理论框架。

二、崛起国的声誉变化与声誉重构^①

(一) 崛起国的三种声誉

国家声誉是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为一国类型的判断。由于崛起国总是形成了对主导国际体系的冲击,崛起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接受程度就成为其类型的标志。按照秦亚青教授的研究,崛起国与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大致划归三个范畴: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和逆向认同。正向认同指国家对主导国际社会持认可态度,逆向认同则对国际社会持反对态度,零向认同则采取游离态度。^②

根据崛起国对待既有的国际社会的态度,崛起国可能获得以下三种声誉: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和融合主义者(integrationist)。^③修正主义者总是积极地试图改变既有的国际体系,不遵守既有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试图建立一个自我设计的国际体系;机会主义者在对待既有国际体系的态度上比较模糊,只有当既有国际体系的规则有利于自身利益时才予以遵守,不利于其自身利益时则不遵守,将会积极寻求改变规则;融合主义者则完全认可既有体系的合法性,不论外部条件是否利己,都将遵守既有国际体系的规则。

虽然其他国家无法清楚地知道崛起国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国家,但是它们确实都会对崛起国产生某种评价和认识(belief)。而这种认识则构成了崛起国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声誉。通过对崛起国的这种认识,其他国家能够形成对崛起国行为的某种判断和预期。人们形成对崛起国类型的认识时,除了会观察其行为是否遵守既有国际体系的规则之外,还会将某个具体行动的背景环境纳入思考的范畴。崛起国是否遵守国际体系规则的行为,可以部分地透露出其属于何种类型国家的信息。然而,这一点并不够,其他国家还会结合分析崛起国采取某个具体行动时的背景环境来进一步形成认识。人们会对崛起国采取行为的背景环境作出判断:这一环境是否有利于崛起国采取这一行动?崛起国在这一环境下采取这一行动是否更为困难?崛起国的实际行为与背景环境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判断其类型的基本信息素材。

(二) 崛起国的声誉维持与变化

其他国家对于崛起国类型的先验判断,导致了对其行为的某种预期和判断。如果崛起国的后续行为符合了这种预期,那么其他国家将可能继续维持这种判断,这样就保持了既有的国

① 这一部分的理论框架完全借鉴了迈克尔·汤兹的声誉模型,汤兹的分析问题是:投资方如何形成对借贷方的声誉认识,从而进行国际投资行为的,见 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笔者则借鉴这一模型,以用于分析崛起国的声誉塑造问题。

②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9 页。

③ 这一说法部分借鉴了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W. Legro)的分类,见 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11.



家声誉；而如果崛起国的行为背离了这种预期，则其他国家会通过结合当时的背景环境的信息来修正已有的判断，导致声誉的改善或者降低。例如，假设一个崛起国先前被普遍认为是修正主义者，其他国家广泛地形成了这种预期：这一崛起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采取遵守既有国际规则的行为。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与这一预期相反，这将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动摇对已有判断的信心，开始修正先前的认识，进而使崛起国的声誉得以改善。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国家。假设某个崛起国被广泛地认为是机会主义者，其他国家形成的先验预期是：崛起国在有利的条件，会选择遵守既有的国际规则，而在不利的条件下，它则会选择不遵守规则。如果在给定的有利条件下，崛起国没有遵守既有规则，那么其他国家就降低对其类型的认识，进而崛起国的声誉遭到损害；同样，如果在给定的不利条件下，崛起国遵守既有规则，那么其他国家将提高对其类型的认识，进而使其声誉得以提高。相反，机会主义者在给定的有利条件下遵守国际规则，或者是在给定的不利条件下违背国际规则都不会造成声誉受损。

对于融合主义者而言，其他国家的普遍预期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融合主义者都将采取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因而，不论是在有利条件下，还是在不利条件之下，崛起国采取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都只能维持已有的声誉，而采取违背国际规则的行为将导致声誉受损。以上的分析可总结如下，见表-3：

表-4：崛起国声誉维持和变化的机制

崛起国类型	修正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		融合主义者	
	有利条件	不利条件	有利条件	不利条件	有利条件	不利条件
遵守国际规则	↑	↑	X	↑	X	X
违背国际规则	X	X	↓	X	↓	↓

注：1、 X 表示声誉不变；↓表示声誉下降；↑表示声誉上升。

2、此表借鉴了 Michael Tomz 的研究，见 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

这一理论框架为国家声誉如何在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融合主义者之间发生变化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框架。但是仍然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当其他国家获得的新信息与它们对崛起国先前的预期发生差异时，是否就一定会修正先前的认识呢？不一定。关键取决于先前认识的固化程度，同时也取决于新信息的可靠性和明晰性。假设一个崛起国的修正主义者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那么新信息的产生并不一定带来声誉的改变，需要取决于其他国



家对新旧信息的权重的比较。如果其他国家认为，新信息更能够反映出崛起国的特征，而过去的认识（旧信息）比较模糊，那么新信息可能导致国家声誉的变化。同样的，新信息的可靠性和明晰性也能够影响到其他国家赋予它在决策中的权重。^① 尽管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知觉过程容易扭曲新信息，以便使其与旧信息“兼容”。但是，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生死存亡，人们没有理由去固守已有的认识，而会积极、理性地去吸纳新信息，改进自己对他国的判断。

其次，新信息也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假设当人们观察到的结果与先前对修正主义的崛起国的预期相反时，就开始逐步质疑已有的认识。随着越来越多的新信息表明，崛起国的行为并不符合修正主义者的做法时，已有的判断逐步开始修正的过程中，新信息的效用也将不断递减，以致最后其他国家形成对崛起国的新的类型（机会主义者）的判断时，这些信息只能维持新的声誉，而无法进一步改善声誉。

简而言之，新信息是否与先前行为预期吻合是声誉维持和变化的关键。然而，这一分析框架仍然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声誉总是难以发生变化。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引进声誉破坏和恢复机制的分析。

（三）崛起国声誉的破坏与恢复

按照上文的理论框架，当一个国家的声誉形成之后，国家声誉就很难发生变化。例如，假设人们根据崛起国长期的行为表现，认为它是修正主义国家。然后，随着崛起国的行为不断与人们的预期相悖，这一新信息能够逐步动摇人们对崛起国过去的判断。然而，却很难发生声誉的根本变化，进而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提升为机会主义国家。原因在于，旧有的认识是基于大量旧信息的积累，而每个新信息的权重却远远小于旧信息的权重，这样崛起国的类型就很少有机会发生改变。

通过引进政治变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政权的更替是每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家偏好发生变化常常是经由政权更替而产生的。因此，其他国家对崛起国的类型的重新评估最容易发生在政权更替之时。政权更替之初所产生的新信息，对于其他国家领导人判定崛起国类型时具有很高的决策权重，先前政权行为的信息在政权更替后，对于它们而言，只有微弱的决策权重。因此，政权更替提供了国家声誉破坏和恢复的契机。例如，1917年俄罗斯革命之后，新政权拒绝承认旧政权的债务，导致了其他国家对它的重新认识，形成了新的声誉。这一点，在上文的理论框架中是无法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国家声誉是一项稀缺的资源，虽然建立很难，但是要破坏它是却非常容易的。

三、案例分析：中国负责任大国声誉的形成

1997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并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稳定。当日本实行货币贬值

^① 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18.



时，中国决定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这个决定是为了稳定危险的国际金融形势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为此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外国一些经济学家最初将中国采取这一措施归因为利己主义的动机。例如，如果人民币贬值，对中国而言，经济方面的后果将是消极的。事实上，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做法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是不合意的行为，与它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因此，观察家们不断预测中国会很快改变政策。可是，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的是，中国付出了重大代价，一次次地重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这种情形下，西方观察家不得不将这一行为归结为，这是中国为地区稳定而采取的“负责任”的行为，中国也因此形成了“负责任大国”的声誉。1998年年初，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一道高度赞扬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负责任的行为，认为“北京是稳定和负责任行为的支柱……”。希拉克宣称，“北京选择人民币不贬值，已经表现出‘极为负责、合作的态度’”。香港《大公报》编辑总结说：“最近中国宁愿遭受损失也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向世界所有人展示了一个负责任、信守承诺的大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确实，1998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桑特（Jacques Santer）访问北京时，针对中国人民银行官员保证“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认为“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了负责任态度”，他还附和布莱尔、希拉克的评论，称赞中国是“地区经济与金融稳定的支柱”。^①

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行为表现及其对声誉的塑造再一次验证了国家声誉形成的研究结论。由于中国被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当中国付出沉重代价维护亚洲金融稳定，从而使中国获得了“负责任大国”的声誉。同时，这一例子也表明，国际政治中国家声誉的形成是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尤其是在敌对的国家之间。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声誉并不是一笔可以不断享用的资源，它是国际政治中的绝对稀缺品。一个国家在一次国际危机中所形成的“有决心”的声誉并不意味着在下一次危机中就一定会坚持同样的立场。领导人更替、国内政治变迁都可能影响国家声誉的延续。“负责任大国”的声誉随着领导人的更替，逐渐失去了。需要重塑新的中国国家声誉。

总而言之，崛起国可能享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融合主义者的声誉。这种声誉的维持与变化取决于崛起国的行为是否与人们的预期相符。当预期相符时，国家声誉得以维持，而预期相悖时则可能导致声誉改善或者受损。然而，这一模型容易导致国家声誉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的情况。通过引进政权更替，可以有效地解释声誉的破坏和恢复。也就是，在国家政权更替之时，国家声誉将进行重构的过程。并且以中国负责任大国声誉形成的过程对理论进行了一定的验证。

四、结论

本文对国家声誉问题进行了研究。不论是国际关系的先哲，还是当代的理论家，都认识

^① 这一案例的分析，主要来自金峻远：《迎接挑战：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章。



到国家声誉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权力资源。研究国家声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国家声誉与国际威望、国家形象和可信度等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国家声誉是其他行为体对某国类型的判断和认知。并且总结了三个流派对于国家声誉如何形成的研究。

在全文的核心部分，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崛起国如何塑造并改变声誉的理论框架。通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案例进行了验证，符合理论的预期。然而，关于国家声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声誉形成的复杂性，一个领域的声誉是否可以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一个时段的声誉是否能够延续？声誉的多重性如何调和？等等，这都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责任编辑： 陈冲）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二）

陈冲* 刘丰**

【编者按】国际关系研究者经常面对一些需要运用数据进行比较、检验或支持的问题。一般而言，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可以获得相应数据：收集新的数据和利用已有数据。然而，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第一种方法并不一定可行，因为这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设计出一套科学、客观、可复制的数据收集程序和方法，使得收集的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达到科学研究的水平，这对大多数研究者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挑战。鉴于此，面对待解决的经验问题，国际关系研究者首先可以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已有数据进行研究。但是如何获得和使用这些数据一直是定量研究面临的一个难题。为此，本刊“他山之石”栏目将分期刊载陈冲和刘丰两位作者撰写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一文。在第3期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冲突/冲突过程的数据库”，本期将刊载“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组织数据和调查数据”等数据库的介绍，包括它们的主要用途、特征、使用方法以及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 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库

（一）国际经济数据

布鲁明等人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研究季刊》和《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三份杂志1995-2005年发表的文章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主题达到了30.4%，位居第一；而且在每一份杂志中所占的比例也都是最高的。^①在亨塞尔的调查中，经济议题的文章占到了所有定量分析文章比重的四分之一，而且在国际国内冲突的研究中，经济变量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在这些定量分析中，经济议题一般包括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与增长、货币政策、对外援助、制裁、债务等。

表-4展示了几种不同的经济数据。第一种是“宾大世界经济表”(Pen World Table, PWT)。^②它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主持，2009年8月更新的6.3版本涵盖了世界上189个国家1950-2007年的国民生产情况。由于其收录数据的权威性和完整性，PWT在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WT数据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相互补充，尽管世界发展指数涉及的变量更为全面，涵盖的经济问题也更多，但是遗憾的是“世界发展

作者简介：*陈冲，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① Marijke Breuning, Joseph Bredehoft, and Eugenez Walton,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An Evaluation of Jour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4, Dec. 2005, p. 453.

②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pwt.econ.upenn.edu>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指数”需要付费使用。^① 在佩伊维·卢亚拉 (Päivi Lujala) 的研究中, 他使用 PWT6.0 的数据来探究为什么资源依赖型国家爆发的国内冲突比其他国家更多这一问题, 他发现国家汲取资源的方式以及资源所在位置对于国内冲突发生具有显著性的影响。^②

表-4: 国际经济数据

数据库	主要用途	时间年限	数据格式	比较
PWT 6.3	GDP、GNP、收入、经济开放度、储蓄	1950-2007	MS Excel(.csv), SAS 和在线数据	从覆盖的宽度来说, UNCTAD 涵盖议题更为广泛, 更新也最为及时; 而 COW 的贸易数据时间跨度最大, 对于历史经济数据的记录比较有代表性; 另外两种数据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数据, 在准确性上比较可靠; 格莱迪奇的扩展数据很好地处理了缺失数据的问题, 比较精确。
COW International Trade	双边贸易额与进出口额	1870-2006	MS Excel(.csv)	
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	GDP、人口和双边贸易	1948-2004	.readme 和(.asc)	
UNCTAD	世界贸易、商品、商业船只、人口劳动力、FDI 等	1970-2009 (部分追踪到 1950 年)	.ivt 和 MS Excel(.csv, .xls)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

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国家间的贸易数据也比较完整, 战争相关项目的“国际贸易数据”(COW International Trade)^③ 便是其中一种。该数据库收录了 1870-2006 年期间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额,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凯瑟琳·巴比里 (Katherine Barbieri) 等利用 COW 的贸易数据检验了几种关于贸易与冲突关系观点, 并详细介绍了 COW 的贸易数据的建立和使用情况。^④ 另一种关于贸易和 GDP 的常用数据库是由克里斯汀·格莱迪奇 (Kristian Gleditsch) 收集的“扩展贸易与 GDP 数据”(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⑤ 该数据库很好地处理了冲突研究中的“缺失数据”问题。作者利用其他替代资源, 改变赋值的规则, 扩展了既有的关于 GDP 和贸易的数据 (主要是 PWT 和 IMF 的贸易数据)。由于在缺失数据的处理上格莱迪奇的数据更为可靠, 该数据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许多研究成果中都会加以利用。例如, 在最近关于国家

① 相关介绍可参考 <http://www.worldbank.org/data>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② 参考 Päivi Lujala, “The Spoils of Nature: Armed Civil Conflict and Rebel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1, Jan. 2010, pp. 15–28.

③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④ 参考 Katherine Barbieri, Omar M. G. Keshk, and Brian Pollins, “Trading Data: Evaluating Our Assumptions and Coding Rul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6, No. 5, Nov. 2009, pp.471–491.

⑤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参考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5, Oct. 2002, pp. 712-724.可在 <http://privatwww.essex.ac.uk/~ksg/exptradegdp.html> 下载最新版本的数据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之间的双边贸易是否对冲突方的调解出现产生影响的研究中,博梅尔特主要使用的是格莱迪奇的“扩展贸易与 GDP 数据”。^① 汉·多鲁森 (Han Dorussen) 和休·沃德 (Hugh Ward) 则利用该数据库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检验了国际组织、贸易以及民主与和平的关系。^②

另一种经济数据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 数据。^③ 它免费提供了关于世界贸易、投资、发展和国际金融流动的相关数据,包括“国际商品贸易”(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国际贸易服务”(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国际贸易商品服务”(International trade in merchandise and services)、经济趋势 (Economic trends)、对外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部金融资源 (External financial resources)、人口和劳动力 (Population and labour force)、商品 (Commodities)、海洋运输 (Maritime transport) 数据,它在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广泛。例如利用 UNCTAD 的 1980-2000 年 FDI 的数据,玛吉特·巴斯曼 (Margit Bussmann) 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分析经济一体化中的 FDI 的存量 (stocks)、流入 (inflows) 和流出 (outflows) 对国际冲突爆发的影响。他发现 FDI 的流入和存量减少了爆发重大争端的风险。^④ 另外,目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统计报告中能够获取许多国际经济方面的数据。^⑤

(二) 地理环境和政治数据

近年来在冲突研究中地理变量正在受到广泛的关注。^⑥ 表-5 展示了几种主要的政治地理环境数据。第一种是 COW 的“毗邻数据”,包括“直接毗邻数据”(Direct Contiguity data) 和“殖民依附毗邻数据”(Colonial/Dependency Contiguity data)。^⑦ 直接毗邻数据测量的是 1816-2006 年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的直接毗邻程度,毗邻国由五类构成,一种是陆上毗邻(路上边界或河流),另外四类是水域毗邻(以 12, 24, 150 和 400 英里为准)。殖民依附毗邻数据则是根据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由与其殖民地或依附国,或者两个依附国之间的殖民或依附关系测量的。COW 的毗邻数据在国际冲突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例如,威廉·里德 (William Reed) 和戴娜·千叶 (Daina Chiba) 将毗邻领土效应分解为可观察的和不可观

① 参考 Tobias Böhmelt,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p. 566-592.

② 参考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1, Jan. 2010, pp. 29-42.

③ 关于 UNCTAD 数据的相关介绍和下载参考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1584&lang=1>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④ 参考 Margit Bussman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March 2010, pp. 143-153.

⑤ 例如世界银行的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 (前身是 World Debt Tables), 世界发展指数它们分别可以在 <http://go.worldbank.org/9GEOFVEAS1> 和 <http://www.worldbank.org/data> 上获取, 但这些数据一般都需要研究者自己购买。

⑥ 关于“地缘的毗邻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在研究联盟行为时作出的精辟论述, 参考 [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⑦ 这两种数据均可在 COW 的网站上下载, 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测的效应来对军事冲突与两国之间的边界关系进行研究。^① 除此之外，COW 还提供了“国际军事冲突发生地点”（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 MIDLOC）数据用以研究地理环境位置对国际争端发生的影响。^②

表-5: 政治地理环境数据

数据库	主要用途	时间年限	数据格式
地理资源数据	COW Contiguity data	国际或殖民国家的地理位置距离 1816-2006 1916-2002	MS Excel(.csv)
	PRIO Geographical and Resource Datasets	国家地理数据、自然资源数据（钻石、石油、河流）	1815-2001 Stata(.dta) 和 MS Excel(.csv)
	TFDD	国际河流、关于淡水资源的合作与冲突事件	1820-2007 1950-2008 在线访问数据
自然灾害	EM-DAT	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及其范围	1900-2010 MS Excel(.csv)
政治数据	Polity IV	政治体制、民主和独裁	1800-2009 SPSS(.sav)和 MS Excel(.csv)
	Political Survival Data	国家层次和领导人层次；	1800-1999 Stata(.dta)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政治腐败、法治	1996-2009 MS Excel(.csv)
	I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Project	政治选举	1972-2005 Stata(.dta)和(.txt) ASCII (comma delimited)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另外，PRIO 提供的“地理和资源数据”（Geographical and Resource Datasets）中也提供国家之间的边界长度。它由凯瑟琳·弗朗（Kathryn Furlong）和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Nils Petter Gleditsch）两人完成，包含了 1815-1997 年国际体系中国家边界变更的确切日期，并提供了一个关于边界长度的比较^③，同时也包括政治实体之间的最短距离数据。除此之外，PRIO 还提供了“钻石资源”（Diamond Resources）、“石油数据”（petroleum datasets）

^① William Reed and Daina Chiba, “Decompo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iguity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 Jan.2010, pp. 61-73.

^② 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考 Alex Braithwaite, “MIDLOC: Introducing the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1, Jan. 2010, pp. 91-98. 该数据可以在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③ 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考 Kathryn Furlong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The Boundary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1, February 2003, pp. 93-117.



等资源数据。^① 另一种关于自然资源争端的数据是“跨国淡水资源争端数据”(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②, 它由六个子数据库组成, 包括 1820-2007 年的“国际淡水条约数据”(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1950-2008 年的“国际淡水事件数据”(International Water Event Database) 等。

自然灾害经常被作为一个诱因纳入到国内冲突的分析中。由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研究中心收集的“紧急事件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EM-DAT) 收录了 1900 以来的包括干旱、火山、海啸、森林火灾等 11 种自然灾害。^③ 例如查尔斯·科恩(Charles Cohen) 和埃里克·韦尔克(Eric D. Werker) 根据这个数据的经验观察提出了一个自然灾害干预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用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政府在自然灾害的防止上会有不同的表现, 进而探讨政府对国际援助选择的动机问题。^④

对于政治数据的关注主要受到“民主和平论”研究的推动。政治数据一般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政治制度(比如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 二是政治领导人的数据。最常用的政治数据是“政体 IV”(Polity IV)^⑤, 它包含了 1800-2009 年 163 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数据, 它的分值从 -10 (最不民主) 到 +10 (最民主), 西方研究者一般将分值在 +6 以上的政体视为民主政体。从 1975 年最初发布的 Polity I 到 2009 年最新版的 Polity IV, 该数据库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冲突研究中, 作为衡量政体民主与否的一个指标。例如, 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 西蒙·胡克(Simon Hug) 和 卢茨·克雷布斯(Lutz F. Krebs) 利用 Polity IV 数据研究了民主化与国内冲突的关系, 发现民主化导致的冲突仅限于政府间冲突而不是领土冲突。^⑥ 道格拉斯·吉布雷(Douglas M. Gibling) 利用这个数据研究了国家领导人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对国内集权的改变, 以达到一种“团结”效应, 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存在。^⑦ 另一种“政治生存数据”(Political Survival Data) 关注国家制度和领导人两个层面^⑧, 该数据由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等人收集整理, 梅斯奎塔利用该数据提出了“政治生存理论”(Political Survival Theory)。^⑨

① 关于这些数据的介绍和下载可参考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Geographical-and-Resource/>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②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database/>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③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访问 <http://www.emdat.be/>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④ 参考 Charles Cohen and Eric D. Werk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Disast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6, Dec. 2008, pp.795-819.

⑤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⑥ 参考 Lars-Erik Cederman, Simon Hug and Lutz F. Krebs,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August 2010, pp. 377-394.

⑦ 参考 Douglas M. Gibling, “Outside-In: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Threat on State Centraliz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4, August 2010, pp.519-542.

⑧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nyu.edu/gsas/dept/politics/data/bdm2s2/Logic.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⑨ 参考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数据涵盖了1996-2009年世界213个经济体六个维度上的治理指标,包括“言论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和无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①另一个政治数据是由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提供的“制度与选举项目数据”(I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Project)^②。它收录了1972-2005年间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的政治选举数据,该数据库的特点在于它广泛的变量设置(从立法机构到中央银行)和国家范围(民主和专制国家)。由于采用了与COW相同的国家编码,它能够很好地与COW的其他数据兼容。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有关国际组织和条约的数据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分析态度的调查数据。

三、组织数据与调查数据

(一) 国际组织/条约数据

表-6展示了几种主要的国际组织/条约数据。第一种是COW项目的“政府间国际组织”(COW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W IGO)数据。^③它收录了1815-2005年间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信息,它对IGO的定义是至少包含3个民族国家成员。根据分析单位不同,它的数据形式包括3种,第一种是按照IGO组织,根据IGO成立时间列出所有的IGO成员;第二种根据国家来组织,列出国家参加的所有IGO;第三种列出了每一个IGO所有的联合双边成员。该数据是研究国际组织最常用的数据。例如伊莉莎白·福塞特(Elizabeth Fausett)和托马斯·沃尔吉(Thomas J. Volgy)利用COW的IGO数据研究了冷战之后东欧和中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IGO对低程度的冲突的影响。^④汉·多鲁森和休·沃德利用该数据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检验IGO成员联系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证实了康德的假设。^⑤

国际同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由布雷特·阿什利·利兹收集的“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数据收录了1815-2003年所有国

①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govindicators.org/>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②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2.binghamton.edu/political-science/institutions-and-elections-project.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③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④ Elizabeth Fausett and Thomas J. Volg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Parsing Out IGO Effects for Alternative Dimensions of Conflict in Postcommunist Sp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1, March 2010, pp.79-101.

⑤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2, April 2008, pp.189-212.



家签订的军事同盟协定。^① 例如,利兹、迈克拉·马特斯和杰里米·沃格尔(Jeremy S. Vogel)利用这一数据研究国内领导人的变更对国家履行国际条约承诺的影响,他们发现威权政府领导人的变化容易导致国家放弃条约义务,而民主国家没有这种影响。^② 另一种同盟数据是COW的“正式同盟数据”(COW Formal Alliance data)^③,它收录了1816-2000至少两个国家签订的所有防御协定、中立或非侵略条约(neutrality or non-aggression treaty)或者谅解协议(entente agreement)。它不仅提供了同盟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的时间,而且也包括该同盟的生命周期。托马斯·普卢佩尔(Thomas Plümper)和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同时利用COW同盟数据和ATOP数据作解释变量来研究国际同盟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④

表-6: 国际组织/条约数据

数据库	主要用途	时间年限	数据格式	比较
COW IGO data	共同的国际组织成员	1815-2005	MS Excel(.csv)	COW的IGO数据涵盖的时间跨度最长,由于对国际组织的界定比较宽泛,它所收录的数据样本也最多,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数据;ATOP数据收录的是军事条约,主要关注的是条约的生命周期;COW的同盟数据对于条约的定义宽泛,重点关注的是条约的成员国;ICOW的条约数据仅仅关注明确要求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组织,样本较小。
ATOP data	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协定	1815-2003	Stata(.dta)	
COW Alliance data	防御条约、中立条约、谅解协议	1816-2000	MS Excel(.csv)	
ICOW MTOPS data	在其章程中明确要求和 和平解决争端	1816-2001	Stata(.dta)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

亨塞尔的ICOW项目提供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多边条约”(Multilateral Treaties of Pacific Settlement, MTOPS)数据,涵盖了1816-2001年间所有的全球和地区在其章程中明确要求其成员和平解决争端的组织信息。^⑤ 它目前收录的数据包括超过30多个全球和地区国际组织的信息。克里斯塔·威甘德(Krista E Wiegand)和伊米莉亚·鲍威尔(Emilia Justyna Powell)在研究国家过去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对解决争端的影响时利用了这一数据。^⑥ 除了上面介绍的

①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atop.rice.edu/> (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0月31日)。

② Brett Ashley Leeds, Michaela Mattes and Jeremy S. Vogel,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2, April 2009, pp. 461-476.

③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0月31日)。

④ Thomas Plümper and Eric Neumayer, "The Friend of My Enemy is My Enemy: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9, No. 1, Jan. 2010, pp. 75-96.

⑤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paulhensel.org/icowdata.html#mtops> (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0月31日)。

⑥ Krista E Wiegand and Emilia Justyna Powell, "Past Experience, Quest for the Best Forum, and Peaceful Attempts to Re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ublished online 16 August 2010.



这四种主要的国际组织/条约数据之外，还有埃里克·弗滕（Erik Voeten）收集的“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数据”（Documenting Vot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data）^①，它记录了1946-2008年所有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

（二）调查数据

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的数据是关于民众政治态度的数据，这些数据一般都是由一些调查机构开展收集的，例如盖洛普民意测验、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测验数据等。关于政治态度的主要调查数据有三种。第一种是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数据（Chicago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ublic Opinion Survey）^②，自1975年以来，它每两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来比较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公众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同时也会不定时地开展一些具体问题的调查，例如2008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查，2006年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调查等。另一种民意调查数据是欧洲委员会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即“欧洲委员会公众舆论分析”（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ecto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③，它自1973年开展以来，每年都在成员国开展一些对重要问题的调查。第三种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④，涵盖了1981年以来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数据，它的调查单位不是按照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分为不同的社会，比前面两种调查的范围都要广泛。除此之外，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数据也是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但是其大部分数据都实行收费制度，不便于获取。罗普中心（Roper Center）免费提供了盖洛普的所有民意测验数据。^⑤例如，迈克尔·穆索（Michael Mousseau）在关于从社会经济根源解释民主和平论的机制的研究中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用以检验个人在合约密集型 and 收入不平等社会中的行为。^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还经常使用其他一些数据如事件数据（event data）和恐怖主义数据。事件数据分析方法是研究国际行为体互动特征的一种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代表性的事件数据库有“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Kansas Event Data System，

① 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考 Erik Voeten “Resisting the Lonely Superpower: Responses of States in the UN to U.S. Dom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3, August 2004, pp. 729-54. 该数据可以在 <http://www9.georgetown.edu/faculty/ev42/UNVoting.htm> 下载（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②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fr.org/pos_overview.php（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③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④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⑤ 参考 <http://roperweb.ropercenter.uconn.edu/>（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⑥ Michael Mousseau, “Democratic Peace: The Social Market Roots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4, Spring 2009, pp. 52-86.



KEDS) (即现在的“宾州事件数据项目”(Penn State Event Data Project)^①，“冲突与和平数据集”(Conflict and Peace Databank, COPDAB)，“世界事件互动测量”(World Events Interaction Survey, WEIS)^②。例如克莱顿·锡恩(Clayton L Thyne)在关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释放出的信号对拉美政变的影响的研究中就使用了COPDAB和WEIS这两种事件数据。^③“9·11”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的关注越来越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恐怖主义事件数据有“全球恐怖主义数据集”(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④。例如，崔承唤(Seung-Whan Choi)利用GTD数据研究了民主国家的“法治”制度是否为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⑤此外，关于测量“权力”(或国家能力)的数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数据。几乎每一项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都会提及COW的“国家物质实力数据”。它根据国家的总人口、城市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费、军事人数、军费开支等指标测量了1816-2007年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实力。“国家综合国力指数”就是根据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变量计算得出的。^⑥

我们简要回顾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几类定量数据，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能够介绍的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数据需要研究者们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需要去“发现”，也需要研究者们根据已有的数据整合、甚至重新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责任编辑：狄英娜)

① 在2010年1月，原来由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主持的“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改由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的政治学系主持，这一数据库的网站也随之改变，参考<http://eventdata.psu.edu/>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1月4日)。

② 这一数据同样可在“宾州事件数据项目”网站上获取，参考<http://eventdata.psu.edu/data.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1月4日)。

③ 参考Clayton L Thyne, “Supporter of Stability or Agent of Agitation? The Effect of US Foreign Policy on Coups in Latin America, 1960-9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 4, May 2010, pp. 449-461.

④ 详细介绍参考<http://www.start.umd.edu/start/data/gtd/>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1月4日)。

⑤ 参考Seung-Whan Choi, “Fighting Terroris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Onlinefirst, June 15, 2010.

⑥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1日)。



欲把国关比天文——我心目中的国际关系学

杨原*

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国际关系学？我会先问你，什么是天文学？如果说天文学研究的是天体运行的奥秘，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关系学同样在探索国家等行为体行为的规律。如果说宇宙中有无数颗星体在闪烁明暗，那么我会告诉你，世界上也有众多的国家在沉浮变换。如果说宇宙中有个由许多星体组成的系统名叫“银河系”，那么我会告诉你，人类世界中同样有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系统名叫“国际体系”。如果说即使是浩瀚的宇宙也会时时有星体间的剧烈撞击，那么我会告诉你，辽阔的人类世界中同样常常会有国家间的战争与危机。如果说宇宙中还有如北斗七星那样联结一体结构恒定的星座，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体系中也有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国家联盟攻守统一，牢不可破。如果说宇宙中的星云可以向恒星转化，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体系中也有像欧洲联盟那样的国家间组织正在走向国家。如果说即使是巨大如太阳一样的恒星也会爆炸，那么我会告诉你，即使是强大如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也会解体 and 分化。如果说银河系中的星体无论形状、质地有何差异，都以自身的质量来决定自己运行的轨道和框架，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无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有何区别，都以自身的相对实力来设计自己的战略规划。

如果说天文学中有专门研究某个星体的专家，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关系学中同样也有人专门研究某个国家。如果说还有许多天文学的业余爱好者每天都在观测天空记录某个星体的运转演变，那么我会告诉你，同样有众多国际关系学的业余爱好者时时在观察和谈论某个国家的外交表现。如果说天文学的开山鼻祖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关系学的创派祖师是同样来自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如果说近代天文学的开创者叫伽利略，那么我会告诉你，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创立者叫摩根索。如果你说是牛顿第一次让人们无比深刻地把握住了天体运行的原理，那么我会告诉你，是沃尔兹第一次从前所未有的高度揭示了国际体系运转的规律。如果说牛顿的那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三条定律成为了此后几乎所有天文学研究都必需使用的工具，那么我会告诉你，沃尔兹的那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几章论述至今仍是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必然会引用的命题。如果说天文学在牛顿之后还有一位爱因斯坦，是他为宇宙重新“立法”，将天文学推到了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智慧峰巅，那么我会告诉你，在国际关系学界，这样的大师，至今还没有出现……

如果说钻研天文仰望星空获得的美感是多么的难以言宣，那么我会告诉你，研究国际纵览世界的感觉同样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如果说无垠的宇宙充满了无数神奇的谜团，那么我会告诉你，国际关系的世界里有着同样多的未知在等待着你去探索和钻研。如果说探索宇宙中的谜团会激发起你联翩的冥思和遐想，那么我会告诉你，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未知同样会让你产生无穷的求知欲望。如果说每个人都曾有幼时仰望星空的天真童趣，那么我会告诉你，成年后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将是这一美好童趣最浪漫的延续！

（责任编辑：陈冲）

* 作者简介：杨原，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10 级博士生。



多伦多漫笔

段沁*

不觉来加拿大四个多月了，繁重的课程和陌生的环境使我疲于奔命，难以静下心来感悟生活。偶尔闲暇，打开电脑，思绪繁杂，也不知从何写起。闲聊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友永哥鼓励我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一来给生活留份底稿，二来也可以跟南开的朋友们分享海外的生活感受。盛情难却，友命难违，我就尝试着梳理来加以来的生活感受。跨年的夜晚，独坐桌前，百感交集，就以“多伦多漫笔”吧。没有太多的寓意，孤独的人在多伦多追赶四散而去的记忆而已。

在这四个月里，我感受到最多的是挫败感。学习上的不顺利是挫败感的最主要来源。因为语言问题，更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知识基础的不足，我这学期学习很不好。其中，糟糕的口语和听力是我适应学习不顺的最主要原因。在多伦多大学，老师的 lecture 最多占一半，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课堂讨论和活动，老师们只扮演启发引导者的角色。他们尽全力启发我们思考，重点在于我们相互交流想法和观点。在这种环境当中，口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仅仅一个托福口语考试高分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在同学们的发言和讨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不同的语音语调的混杂，而且他们发言的声音是要比老师讲课小很多的，所以一开始我几乎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好在后来听得多了，我就明显感觉好多了。同学们上课时你一嘴我一舌的发言我已经可以听懂大半，小组讨论时候几个同学之间的交流我已经基本明白。此外，学习中的口语表达很多时候也让我觉得非常难，所以这第一学期我的课堂发言是极少的，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是极少的。不过，经过一个学期的一个人围观一群人，现在小组讨论时我也可以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了，即便只是一点点，我知道自己是有进步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仍然会因为听不懂说不出感到极端的挫败，但是我不再让挫败感严重影响我的心情和学习效率，我会努力学会更好地调整情绪。

其次，我的阅读能力，尤其是速度也亟待提高。我的托福阅读是满分，GRE 阅读也没错几个，但是第一学期仍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 reading list, required 的都完不成，更不用说 recommended……这边的课程的阅读量实在太大了，毫不夸张的说，一门课的 required 阅读量绝对大于以前一个学期所有课程的阅读量，而且多大一个学期只有 12 个星期，连本科时的三分之二都不到。这边的同学本科就是这么过来的吧？至少本科也就读过很多很有价值的书和学术文章了吧？相比之下，我的本科实在太荒废了，所以我现在才会觉得这么累的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四个月的锻炼，我的阅读速度已经有了明显提高，至少现在读那些英文书不会再觉得非常痛苦了，至少学会了浏览，学会了快速抓住重点。

还有一个让我产生挫败感的就是思考能力的欠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从大学开始吧），我就几乎丧失思考能力了，这真是个大悲剧。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是基本不需要思考的：上课老师不喜欢你发言；课下没有同学会讨论课堂上的东西；考试不需要思考，只要背书就好了；论文不需要思考，只要会复制粘贴——会总结，会拼会凑就好了。我是个学习国际政治的，但是某些老师会口口声声在课堂说“我们不谈政治，记住这些理论就

* 段沁，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芒克全球事务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Toronto）2009 级全球事务专业硕士生。



好了（当然也只是为考试记住而已）。这就是我的极其可悲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里，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得思考问题。前面就说了，老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拼命启发我们思考，即便有些问题他们都有可能回答不出，他们会诚恳的说：“我本来就不是个专家，某些方面在座的你们知道的经历的可能比我要多得多，这个课堂本身就是个互相学习的地方”。听到老师这样说的时候，我总会觉得特别自豪，特别幸福，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学习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思考能力欠缺除了思维钳制之外，可能和眼界狭窄也有很大的关系吧。相比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经历非常丰富，我的生活经历实在过于单调。他们在大学里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出国实习或者做实地研究的机会，去过非洲，亚洲，欧洲做过实习或者研究的同学非常的多。同样是大学毕业，他们的含金量远远大于我。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感觉本科时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少，经历过的事情也实在太过有限。挫败.....endless frustration.....但是好在我还年轻，而且现在的学校班级给我拥有一个绝佳的平台，虽然第一学期我浪费了很多机会，但是我相信以后我会做的越来越好，在这里学习的经历不管多难多苦，绝对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此外，我现在有了接触以前很多想接触却接触不到的知识、信息和事实的机会。总之，出国之后，我得到了更清楚的看中国的机会，也学到了更全面客观思考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重新找回了思考的习惯。中国的问题很多，不是靠几个小愤青没事骂几句就能解决的。太多的东西需要面对，需要思考。如果以后最终终老于校园，我想我会研究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被挫败感打击之后，我已经慢慢适应了快节奏和开放的学习环境，陌生和孤独也慢慢退去，交了新的朋友，也渐渐融入新的环境，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了。最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也好到没话说。多伦多大学之内就有个巨大的公园，我几乎天天经过。在校园里松鼠和各种小鸟随处可见，而且它们一点儿都不怕行人，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和人类共处的生活；我曾经在一个朋友家从 28 楼往外看，这个城市的植被覆盖率让我震撼，一眼望去除了城市必然会有的高楼林立，便是满眼的葱翠。除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外，最明显的感觉是这边的物价水平对于本地人（赚加币生活的人）来说实在是太 sweet 了。相对于收入而言，这里的生活成本之低是我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最简单的例子——这里的最低时薪是 10 加币，4 升牛奶的价格在 6 加币左右；中国人的最低时薪肯定不到 RMB10，但是在中国买 4 升牛奶大概需要 30 块。对于这种差异我不想多做评价，但是确实给了我足够的动力让我好好努力尽量留下来。

回头看看，这四个多月是我人生中最丰富的一段时光，前途仍然未知，生活仍要奋斗。所以思绪翻滚，罗里罗嗦写了这么多，不过真心希望这些对打算出国的朋友有所助益。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想家，爱我的国家，也爱这个大学、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我有点纠结。说到这里，已经是 2011 年了，所以送给朋友们，也送给自己一句话：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 new year. Maybe everything will just stay the same, but I know I will change, definit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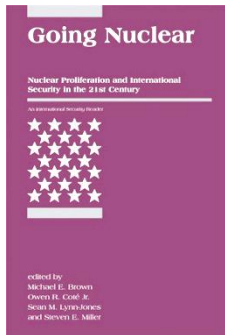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陈永）

新书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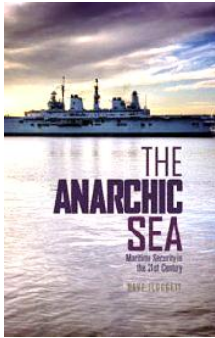
克里斯托弗·达斯、卡梅里尔斯·弗里森朵夫编著：《重新考虑安全治理：无意识的后果问题》，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Christopher Daase and Cornelius Friesendorf,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Problem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本书探究了安全治理行动的无意识后果及如何限制其负面效应。传统的安全政策通常是由国家独自把持且重在军事防卫，而安全治理则是由多元行为体来完成并致力为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创造一个全球的安全环境。通过集中国家、国际组织及私立团体的优势，安全治理为应对当今的安全风险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总的来说，安全治理被假定作为一种“好东西”，但这种假定使得学者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无意识的后果。无意识的后果并不必然是消极的，虽然它们通常是如此，如中情局的术语“后座力”——一种长期受培育的团体调头反对它的资助者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书旨在唤起大家对不希望有的甚至与初衷自相矛盾的政策结果的注意，并提供了避免这种损害或者限制损害规模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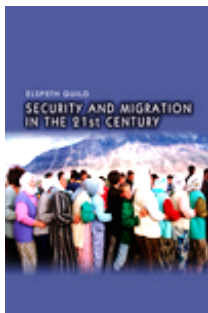
密歇尔·布朗、斯蒂芬·米尔勒等编著：《远离核武：核扩散和21世纪的国际安全》，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0年。（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Going Nuclear: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核武器扩散无疑是21世纪全球安全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限制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可能是阻止一场核战争或者核恐怖主义灾难的关键。本书就当前控制核扩散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概念的、历史的分析视角，对持续争论的核扩散原因与后果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评述，其中包括考察国家为什么会去寻求核武器及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的核项目进行的研究等。本书的最后部分就如何应对当代面临的主要核扩散挑战进行了回应：保持核武器及核材料远离恐怖分子之手，确保愿意弃核的国家不再改变它们的意志以及严加处置非法传播核技术的网络等。这本优秀文集对于国际安全的学者有重大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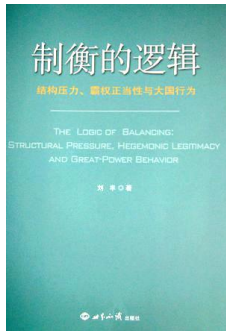
迪夫·斯洛葛：《无政府的海洋：21 世纪的海上安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 年。(Dave Sloggett: *The Anarchic Sea: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近年来，海洋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重要场所，充斥着毒品走私、武器走私以及把政府和机构的资源据为己有的人群。这些威胁使得那些本来不相关的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到保护海洋贸易和交通的战斗中。然而，控制海上活动的努力也会加剧紧张和冲突，正如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以及北冰洋的罗蒙诺索夫海岭发生的争斗那样。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可能也会迫使各国海军争夺经济上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这些海军力量在世界范围的增长正成为即将发生冲突的迹象。军事能力的发展总是会增加滥用的可能性。本书从七个维度描绘了现代海上安全的形势，最后建议将单个国家纳入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更有效的防护网络中，以缓解无政府海洋中的安全压力。



埃尔斯佩斯·基尔特：《21 世纪的安全与移民》，霍博肯：威立—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9 年。(Elspeth Guild: *Security and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21 世纪的到来给我们理解安全和移民增添了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维度。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中着眼于战争与和平的“老式”冷战安全框架已经让位于具有多重竞争性的概念，包括内部安全、人类安全甚至社会安全等。同时，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在观点和目标上迥异且极具争议的问题。那么，在当今世界，我们所说的安全和移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重要领域是如何交叉联系的？这种政策关切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对于国家和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回答。本书通过近年来的大量事例，从寻求政治庇护者对国家边界安全的影响到对公民规则中认同安全的影响的角度来阐明作者的观点。通过从个人——其在一国为公民在另一国为移民的角度出发，本书仔细探讨了安全——移民关系的主要方面，如与难民的关系、刑讯、特别引渡、隐私和个人资料的保留、人权的保护等。本书对于国际政治、发展研究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师生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在国际政治中，主要大国围绕争霸与反霸展开的斗争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当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威胁时，主要大国有时倾向于采取内部自强或外部结盟等手段应对霸权。但有时制衡行为的强度可能较低甚至出现制衡缺位的情况。在面对霸权威胁时，主要大国是否会采取制衡行为？为什么采取制衡行为？这种行为又为何出现强弱变化？本书以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和霸权更替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的视角，对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制衡霸权威胁的战略行为作出了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本书以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主要大国的策略反应、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斗争以及冷战结束后次等大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回应作为案例，将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三者紧密结合，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本书的理论命题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和检验。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前沿，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格伦·廷德：《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王宁坤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2010年。

人为什么要思考政治？我们究竟该怎样思考政治？在思考政治中，我们将面对哪些问题？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了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如权力和掌权人的关系、权力的限制问题、权力的目的等，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在论述中充满了悖论，展现了不同思想范式的困境。书中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作者希望以此鼓励人们思考。作者认为人必须思考，应该思考而且也不得不思考，因为思考和自由、平等、人性等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思考是对自我的召唤。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责任编辑：李金潼 董祚壮）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第一期：国际关系——多元的视角与方法

一、活动简介

为了活跃我院学术研究氛围，搭建师生交流平台，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论文工作坊”于2010年12月全面启动。“论文工作坊”旨在为我院师生提供一个提升学术作品品质、拓宽研究视野、启发研究思维的学术交流平台。此活动每月开展一次，故也称为“每月工作坊”(Monthly Workshop)。入选“论文工作坊”的优秀论文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将以特刊的形式发表在《新视界》杂志上，并向论文作者颁发纪念奖品。第一期论坛2010年12月10日成功举办，活动的主题是“国际问题研究——多元的方法与视角”，本次活动吸引了国际关系系内外30余名师生的参与。“论文工作坊”第二期论坛拟于2011年3月11日举行，第二期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方法”，欢迎参加。

二、第一期论坛简报

2010年12月10日下午6:00，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第一期论坛在范孙楼440举行。本次论文工作坊邀请到周恩来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的刘丰老师担任点评嘉宾，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张健老师以及国际关系和其他院系的近30位师生出席本次学术论坛。会议由《新视界》主编陈冲主持，来自国际关系系2009级的硕士研究生赵岩和陈永同学，2010级硕士研究陈冲同学和2007级本科生李金潼同学分别向大家汇报了自己的论文和研究设计，并与在场的师生交流，刘丰老师的点评更是让大家受益匪浅。



赵岩同学首先报告了他的论文《地位竞争策略与权力转移——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分析》。在这篇论文中，他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试图对权力转移理论关于霸权国与挑战国关系的解释不足进行修正。他将认知因素引入到社会认同理论中，并以1897-1914年间的英德海军竞争为案例检验了他的理论假设。围绕着赵岩同学的研究，与会同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随后的发言中，陈冲同学报告了自己与刘丰老师等合作的《一个分裂的国际关系学科？——基于中美欧主流学术期刊的调查(1980-2010)》的项目研究设计。他们这个项目拟通过对中美欧15种主流的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系统评估，来探究国际关系的“美国特性”是否有所改变，美国的知识霸权地位是否有所消减。

通过设计的 21 个变量，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期刊论文数据库，进而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估中美欧的国际关系学科的演进。与会同学围绕期刊样本的选择、选题的意义和具体操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第三位报告的是陈永同学，他向大家报告了自己的一项最近的研究设计《结构压力下的霸权护持战略》。在这份研究设计中，陈永同学对霸权国如何处理与挑战国的策略做了详细地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分析路径，并引入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政治变量，试图对霸权国在面对修正主义国家挑战时究竟采取遏



制还是接触战略进行回答，引发了同学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李金潼同学，他介绍了自己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设计《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作用》。在梳理了学界关于东亚地区的三种霸权秩序、均势秩序和三角战略协调秩序三种安全秩序后，他表示既有的关注地区秩序界定主要是从权力分配格局进行的，而忽视安全秩序的另外两个维度：一定范

围内的稳定与和平成为共同目标和特定的规

则或制度。因此，既有的三种秩序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东亚在冷战后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和平的状态。由于只是初步的研究构想，与会同学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中国在东亚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激烈讨论。

四位同学发言完后，刘丰老师分别做了简明精要的点评，既肯定了研究的新颖独到之处，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让在场同学都感觉受益匪浅。最后，刘丰老师进行了精彩的总结，首先肯定了本次论坛的积极作用，认为“论文工作坊”活动搭建了师生交流的平台，活跃了学术氛围，非常有利于调动起全系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刘丰老师还结合自身学习和教学的经验，鼓励大家多读书、多交流，开阔视野，充分利用南开校内外的资源帮助自己学好国际关系。

三、第二期论坛征稿启事

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论文工作坊”第二期论坛拟定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举行，第二期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方法”，即日起面向全校征稿。

1. 稿件要求



(1) 稿件要求采用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选题不限。提交的稿件可以是研究项目的设计，可以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报告，也可以是已经完成的论文等（注：本研讨会不接受已发表或出版的论文，判断是否公开发表以本次活动截稿日期准）。

(2) 字数：5000-10000 字为宜。

(3) 论文注释形式为脚注，注释规范请参照《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4) 请在文章末另附页写明作者的姓名、系别、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

(5) 论文尽量做到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论述层次清晰，语言准确，文字流畅。

2. 投稿说明

(1) 投稿截止时间：2011 年 3 月 7 日中午 12 点。

(2)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提交，为方便统计，稿件请以“姓名_论文题目”命名，文件格式为 Word2003 文档（扩展名为.doc），邮件主题请注明“论文工作坊投稿·姓名_论文题目”。

(3) 来稿请发送至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4) 来稿后请注意查收《新视界》编辑部的确认邮件，如 24 小时内未收到回复，请直接与编辑部秘书处联系。

(5) 为了保护作者稿件版权，编辑部秘书处在会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所有稿件发送至讨论人提供的电子邮箱中。

3. 参会说明

(1) 参会讨论者原则上需要阅读其他参会作者的论文，并发表评论意见。

(2) 每位报告者的个人陈述时间为 10 分钟，每位点评者的发言时间不超过 5 分钟，请与会者严格遵守时间。

(3) 个人陈述可自备 PPT。

(4) 作者对稿件拥有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



4. 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新视界》网站：<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新视界》秘书处联系邮箱：nklijintong@gmail.com

“论文工作坊”是国际关系系第一次由学术主办，师生参与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我系师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新视界》编辑部每月将定期举办论文工作坊论坛，力争将它打为国际关系系的品牌学术活动，以提升学术作品质量、拓宽研究视野、启发研究思维，提高同学们的学术研究能力。活动动态请关注《新视界》网站和我爱南开 BBS (bbs.nankai.edu.cn)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版 (ZSG)。

(责任编辑：吕海)

♣ 学术交流 ♣

北大名家做客南开纵论中外国际关系

(通讯员: 刘丰) 11月24日, 由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主办,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承办的“走近中国名刊”系列讲座第21讲在范孙楼举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为南开师生做了题为“从中美关系看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睿壮主持。百余名南开师生聆听, 并与主讲人进行了积极交流。



王缉思以每10年为节点简要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演变历程及特点, 着重分析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其中, 他将2010年的中美关系与“处于历史最好阶段”的2003年的中美关系对比, 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容乐观。王缉

思说: “中美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 中国的对美战略也将发生改变, 这固然与国家安全环境变化、国内政治、舆论环境有关,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中美实力对比发生转化, 以及两国从高层到民间都处于心理调试阶段。”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G2共治”等问题, 王缉思指出, 我们应该思考“和平崛起”所要应对的难题, “G2”的提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应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当前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战略环境, 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 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王缉思平实而幽默的语言风格, 对国际关系深入浅出而又鞭辟入里的分析展现了其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学养, 让现场观众领略了一流国际关系学者的风采。

王缉思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际政治研究》主编, 兼任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等, 是中国最为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之一, 主要研究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他不仅在学术上成果丰硕, 而且参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咨询, 对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决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影响。

华世平教授系列学术讲座

（通讯员：杜福芳）11月15日，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亚洲民主中心主任华世平博士应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程同顺教授的诚挚邀请，在范孙楼116室为同学们做了题为“21世纪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和“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两场学术讲座。政府学院常务副院长杨龙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程同顺教授出席讲座并致辞。

华世平博士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一直与政府学院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他在讲座中鲜明独到的观点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深深吸引了在场的老师和同学。



上午，在“21世纪的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讲座中，华世平教授指出中美关系是立足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同中日关系不同。之后，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反观西方发展缓慢的政治制度原因，进一步分析中国和亚洲的未来走向。接着，从政府传统和世界观的角度分析了中美关系中的沟通问题。在中日关系上，教授提出了自己对民族主义的困惑，引发同学们的深入思考。

下午，在“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的讲座中，华世平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任何理论都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然后讲解了西方学术界的两条主流：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华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文化大环境是“程序大于结果”，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和科学研究各个层面。他还谈到西方学术界的多元化倾向，客观地介绍了学科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

两场讲座后，同学们都积极踊跃地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华教授耐心地回答了提出的问题。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气氛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华世平教授的系列讲座不仅深化了同学们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西方学术界的若干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还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启发逻辑思维。同时，此次系列讲座对于推动政府学院政治学系与西方学界的交流、提升政府学院学术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师生活动 ♣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徐步受聘为我系兼职教授

（南开新闻网）12月23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徐步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并应邀作报告。在范孙楼举行的致聘仪式上，常务副校长陈洪向其致送聘书，党委常委、教务长朱光磊主持仪式。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睿壮教授、党委宣传部部长吴志成教授以及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陈洪向徐步受聘我校兼职教授表示祝贺。他说，南开始终坚持开放办学，社会各界精英俊彦陆续加盟南开，为学校未来发展、学术水平和教学实力的提升贡献重要力量。徐步公使外交经历丰富、学术造诣深厚，必将有力地推动南开在国际问题等领域的研究广泛开展和相关学科的发展繁荣。多年来，南开大学与加拿大许多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良好的合作前景，希望徐步公使加盟南开后能够在进一步密切两地学术交流与办学合作的事业中、开拓学子学术视野的育人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周恩来总理的精神品格和外交智慧鼓舞着我们奋发工作，今天能够成为南开大学的一员，走进周总理的母校，在以伟人命名的学院教书育人，我深感责任重大。”徐步表示，今后他将努力为促进南开大学与加拿大教育



机构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交流合作作出应有贡献。致聘仪式后，徐步做了主题为“美国国内政治的新变化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报告，并与师生开展热烈交流。

徐步长期主管和从事外交战略研究，组织协调国际问题领域专家学者就中国国际战略环境和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欧洲和亚非拉等地区共40多个国家，曾作为六方会谈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朝鲜核问题的有关谈判。他在《外交季刊》、《外交评论》、《国际社会科学》、《和平与发展》等期刊发表多篇文章，曾任《华夏时报》、《东方早报》、《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的时事评论员，就联合国改革、国际



新秩序构建、二十国集团、两国集团、美国反恐战争、美国国家特性及其战略走向等国内外广泛关注问题发表评论。

我系教授中标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南开新闻网)据悉,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吴志成教授承担的“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中标 201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以全球治理的历史演进为线索,以全球治理的前沿理论为基础,运用国际政治学、历史学、环境学、法学与国际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全球治理的历史与实践,分析全球治理的界定、特征、机制、理论与模式的创新,探讨全球治理改革的必要性、措施及对传统理论、观念和国家主权思想的挑战,对民族国家体制、结构、管理过程的影响,进而总结全球治理的一般规律、经验教训以及对世界各地区域治理的启示与借鉴,尤其强调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变革的关系以及西方大国与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不同战略。本课题具体分为全球治理的历史考察、理论分析、国家视角、领域维度、国际机制建设、未来发展和理论创新等七大研究板块,重点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的创新理论——“和谐世界”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应用——“和谐外交”。

教育部自 2003 年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以来,重点支持高等学校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握学科前沿,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今年强调中标项目应瞄准国内和世界先进水平,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国际关系系 2007 级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报告会圆满举行



(通讯员:李金潼)2010 年 12 月 17 日,国际关系系 2007 级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报告会在范孙楼 440 圆满举行。为了更好地指导我系本科毕业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上午 8 点 30 分由王翠文、刘丰、刘兴华三位老师组成的论文评审小组在范孙楼 440 就同学们在选题审批表中出现的问题与大

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同学们的选题内容广泛，包括朝核危机、南海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全球气候谈判等。会上，被选取做报告的同学依次向大家报告了自己的选题缘由、论文思路及存在的困难，随后三位评审老师分别对每一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并指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后老师对每位同学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2007 级国际政治专业的同学和数名留学生及双辅修同学共同参加了本次选题报告会，大家在会上收获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为以后的文献搜集、论文写作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国际关系系 2010 级硕士班级活动月成功举办

（通讯员：江佩佩）2010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国际关系 2010 级研究生在二主楼 A308

举行了主题为“各国风情展，共诉同窗情”的班会活动。活动由班长江佩佩主持。



活动中，来自泰国的许丹妮、越南的黎文新、哈萨克斯坦的马迪娜和古丽佳妮四位同学分别通过幻灯片放映的方式向同学们介绍了各自国家的地域风情和民族文化，不仅加深了同学们

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而且促进了同学们

对彼此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了解，有利于大家在今后学习、生活中的相处和交流。此次班级活动的举办，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可谓是一次成功的班级活动。国际关系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现有注册学生 17 人，其中有 6 位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萨克斯坦、越南、土耳其、泰国和爱沙尼亚。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第一期论坛成功举行

（通讯员：龚秀娟 权贤美）201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6:00，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第一期论坛在范孙楼 440 举行。其主题为：“国际问题研究：多元的方法与视角”。本次论文工作坊由国际关系系的刘丰老师担任点评嘉宾，与会者包括马列学院张健老师等近 30 位师生。

会上，由来自国际关系系2009级的硕士研究生赵岩和陈永同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陈冲同学和2007级本科生李金潼同学分别向大家汇报了自己的论文和研究设计，并与在场的师生交流，刘丰老师的点评更是让大家受益匪浅。报告结束后，刘丰老



师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论文工作坊”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对同学们的学习提出了中肯建议和殷切希望。

《新视界》编辑部每月将定期举办论文工作坊论坛，力争将它打造为国际关系系的品牌学术活动，以提升学术作品质量、拓宽研究视野、启发研究思维，提高同学们的学术研究能力。

我系师生参加第二届“冲突管理和平经济学与和平科学国际学术会议”

（通讯员：陈冲）2010年11月18-19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冲突预防与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冲突管理、和平经济学与和平科学国际学术会议”（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lict Management, Peace Economics & Peace Science）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举行。

本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携手建立和平、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会议吸引了来自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美国、英国、韩国、斯里兰卡、意大利、法国、俄罗斯等国以及中国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杂系统仿真国家站实验室、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后勤指挥学院等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我系阎梁老师和2010级硕士生陈冲应邀出席。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大会围绕冲突与和平、经济发展





与国际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和平科学、国防经济、国防支出、全球安全与恐怖主义、国防工业、战争与和平研究、气候与国际冲突、灾害治理、国防与和平经济学、冲突与和平科学学科建设等专题，共安排了八场小组发言、四个专题讨论会，与会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冲突管理、和平经济学与和平科学国际学术会议”是国际国防与和平经济学、和平科学与冲突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跨学科国际学术会议。首届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一届会议的优秀论文即将由国际权威出版机构 Emerald 出版社出版，本届会议亦将择优选取部分优秀论文由 Emerald 出版社审理通过后正式出版。

我系师生参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与战略机遇” 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国际问题青年学者论坛

2010年11月13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与战略机遇”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国际问题青年学者论坛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我系刘丰老师出席并做大会主题发言，2009级部分研究生也旁听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未来十年大国关系调整新态势、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的新挑战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战略机遇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细致地讨论，其中不乏有洞见的新观点和新主张。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张朝意教授、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主任郭棲庆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以及外交部政规司相关领导出席了论坛开幕式。

国际问题青年学者论坛2007年由国际关系学院发起组织，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该论坛受到了国际关系研究学界的高度赞赏和好评，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品牌。此次论坛的举办得到了北外科研处和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龚秀娟 权贤美）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五，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著作

1. 专著：著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8 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15-17 日，第 3 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

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 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第 165-176 页。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 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 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 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征稿启事

本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办，现面向广大师生长期征稿：

一、引介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学术论文、书评及新书架栏目。

论文习作：传播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争鸣。论证严密，语言流畅，标点符合规范（参考国际关系学系论文注释体例）。字数以 3000-8000 字为宜。

书山有路：品茗大师杰作，抒写我辈见解。不是随意的感想，也非勤奋的摘抄，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严谨客观是首义，独立见解为二德。字数以 3000-8000 字为宜。

新书架：放眼全球，把握书界动态。以笔传神，通晓新书梗概。投稿请注明作者、中英文书名、出版社等，以 250-300 字为宜。

二、关注国际时事动态，“煮酒论英雄”。

青梅煮酒：天下大事谁是英雄，功过是非国关热点任君评说。投稿长短不限，仅盼观点鲜明。

三、搭建广大师生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包括“他山之石”、“院系活动”栏目。

他山之石：经验交流，心得汇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字数不限，畅所欲言。

院系活动：或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沙龙，或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社会实践。欢迎报道院系活动，展示院系风采，200-500 字为宜。

这是一个飞扬着激情与梦想的舞台！

在这里，你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这里，你可以畅游天地，飞跃古今；在这里，你可以重塑思想，锻造灵魂！

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今时的国关学者对话；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不远的国关研究共行；在这里，你可与所有未来的国关方向同步！

这是一本杂志，但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这是一部刊物，而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话都是夸大其词，那么，请你拿起你手中的笔——因为只有你，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来稿请发送至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